

# EUROPE ON TRIAL

The Story of Collaboration, Resistance,  
and Retrib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ISTVÁN DEÁK



## 二战时期的 合作、抵抗与报复

中信出版集团

[美] 伊斯特万·迪克 著 舒琦 译

Copyright

Copyright: 2018

Copyright

Copyright

Copyright 2018

ISBN 9787508684338

Copyright APP

Copyright

□□□□□□

□□□□

□□·□□□□ Béla Stollár □1917—1944□

□□□□□□□□

□□·□□·□□□□ Éva Deák Veress □1922—2010□



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军事对抗和外交角力最终走向了一个苦乐参半的结局：当然，乐的是，纳粹德国战败，但苦的是，苏维埃政权挺进欧洲大陆。尤其是东欧人，对他们来说，战后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比之前纳粹对欧洲的控制影响更深远，在他们的历史意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记。对西欧人来说，无论是被德国人占领的，还是与之结盟的，由于纳粹给人留下的印象太过惨绝人寰，结果西欧人对德国人的姑息纵容、与之共谋的行径都轻易被人淡忘。只要深入研究，任何对“二战”中的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的，希特勒和那些“坏家伙”败了，一个新的、更加文明的欧洲从往日的瓦砾和灰烬中重生。但是，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与战场上的硝烟和国际政治上的筹谋相伴相生的，是一出又一出意料之外的曲折命运，极具讽刺意味。《审问欧洲》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述欧洲人亲历的“二战”，令作者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脱颖而出，也令本书显得尤为重要。这不是今天大多数欧洲人想要记住的战争，也不是浩瀚的军事和外交史料中所分析的战争。

伊斯特万·迪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赛斯·洛荣誉教授（Seth Low Professor Emeritus）。他撰写了大量研究哈布斯堡王朝末年的作品并屡屡获奖。<sup>[1]</sup>但是，迪克对“二战”也显示出了持久的兴趣，他

把“二战”作为案例来研究欧洲人身上的社会和道德秉性。他与托尼·朱特（Tony Judt）以及扬·格罗斯（Jan Gross）合作编写了一本研究战后欧洲报复性司法的著作，极具开创性。他还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评论文章，探讨关于大屠杀、合作和抵抗等话题的最新文献<sup>[2]</sup>，其中很多评论文章都在他2001年的《文集：希特勒的欧洲》<sup>[3]</sup>中结集出版。在战争所带来的道德和伦理考验中，欧洲人表现如何？如果是法官来宣判，通常会给被告定个有罪或无罪，但迪克没有以一个法官的口吻给出最后判词。但是，当读者放下书本，会感觉到书中控诉的立场更强一些，而辩护的立场弱化了很多。不过，当今欧洲人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替战时欧洲辩护，这也是情理之中的。甚至连德国人都开始标榜自己也是受害者，而不仅仅是肇事者。

迪克的作品背后有着强烈的道德热情，这可能来自他青年时期在战时匈牙利的经历，他曾经在强制劳动营待过一阵子，也见证了布达佩斯围城战，一直到战争结束。<sup>[4]</sup>但是，这股热情从未妨碍他对事实的高度尊重，事实主宰了历史的选择。他常常会问读者：假如你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波兰穷苦农民，犹太人乞求你把他们藏起来，你会怎么做？或者，你是一个失业的挪威青年，吉斯林（Quisling）政府鼓励你加入党卫军（Waffen SS），你会怎么做？又或者你是一名抵抗的塞尔维亚战士，一边是德国占领的恐怖，另一边是共产主义游击队的虎视眈眈，你被夹在中间，又该怎么做？假如你是一名政府官员，当时的荷兰在纳粹统治下秩序井然，你会怎么做？你会高效且尽责地为纳粹奉上犹太人的名单吗？名单上的人最终会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地球上抹掉。他甚至让我们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在德国占领者的位

置上。如果你是一个身处意大利（或法国，或波兰）的纳粹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官员，日日面对袭击和爆炸，让你的士兵死的死、残的残，危害着你的军事行动，你会怎么做？你会下令处决平民或囚犯作为报复吗？如果会，到底处决多少才能浇熄怒火而又不过火？

在迪克对战争的演绎中，个人面临的两难境地也折射出战时高层政治的自私自利。拿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来说，为了从德国在西线的战事中获得潜在利益，并把波兰东部领土（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纳入自己的版图，苏联在条约中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反法西斯这一原则。等到纳粹打败了波兰人，夺取了华沙，苏联才入侵波兰东部。苏联在占领波兰东部期间，杀害了22 000名波兰军官和文职官员，把他们的家人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北部的营地；流放的人数就更庞大了。当波兰官员问起那些军官的下落时，苏联官员起先说他们一定是取道中亚离开波兰了，之后又把这起大屠杀的罪名怪到纳粹头上，直到苏联几近解体的时候，还否认自己与纳粹共谋。当然，这些自私自利的举动，并不足以呈现那份残忍的秘密协议全貌，正是这份协议默许斯大林把波罗的海国家和比萨拉比亚（现大部属于摩尔多瓦）并入苏联。

又或者，我们可以想想战时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宣称忠于和纳粹德国的盟友关系，但同时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机会很多）去攻击和破坏另一方的努力，希望借此夺取在他们心目中本应属于自己的领土。事实上，迪克告诉我们，纳粹的军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从欧洲大陆的一端挺进到另一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些潜在的对手不愿意放弃内斗去一致抵抗纳粹的威胁。一言以蔽之，欧洲人宁愿姑息德国人在欧洲为所欲为，也不愿意放弃与邻国之

间鸡毛蒜皮的争斗。东欧如此，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如此。法国，按理说是军事强大的国家，应该准备好为国家主权殊死斗争，却竭尽全力去取悦纳粹占领者。维希<sup>[5]</sup>法国（Vichy France）是傀儡政府中几近完美的典范，在维希政府治下，被占领的巴黎地区轻轻松松地让德国人感到宾至如归。

迪克讲述的是具有启示性的“战时故事”，极具讽刺意味，而故事里各国自私自利、虚伪的面孔，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例如，奥地利人可以算是希特勒最热心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一些关键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岗位上任职，服务于纳粹。但是，在1943年10月签署的《莫斯科宣言》（*Moscow Declaration*）中，同盟国将他们列为纳粹的第一批“受害者”。爱好和平与务实的丹麦人与当地的纳粹官员共同筹划和组织了对丹麦犹太人的海上营救，令他们免受摧残。但是，丹麦人却是纳粹德国的正式盟友，甚至在1941年11月加入过《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

在西欧，德国军官和纳粹官员有时候很克制检点，甚至可以说高贵优雅，超乎我们对占领和战争时期的想象。然而，他们却在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执行野蛮残忍的政策，杀戮，酷刑，放火，在整个地区实施恐怖统治，有时候还招募波兰人、波罗的海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当地人帮他们干脏活，到头来还调转矛头对付这些帮手，毁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与此同时，当地人有时候会利用纳粹暂时的青睐，来推进自己的目标，扳倒其他种族的对手。沦陷区人们的行为难以预料，加上纳粹占领者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今天的我们看战时欧洲人的生活，就像在看一个万花筒，千变万化。没有雷同的情景，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接着我们读到的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在希伯来语中是Shoah），或者说纳粹所称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第三帝国决心消灭所有的欧洲犹太人是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的。在整个事态发展有一些关键的节点，那就是他们一系列痛下杀手的决定，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以及东部战线的暴力升级。总而言之，迪克没有花大篇幅去讲述“种族灭绝之路”，以及纳粹通过大规模处决或死亡集中营来消灭犹太人，这些主题已经被反复研究。他用了一个更广的历史视角，捕捉了犹太人在整个欧洲大陆遭受迫害的场景，令人痛心疾首。这些场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鲜有欧洲人去帮助这些犹太同胞。不过也是，他们能做的少之又少，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非德国籍的欧洲人积极参与，如果不是另外数千万人袖手旁观，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完成得如此高效，如此全面，这也是事实。

当视角从挪威或波兰转到意大利或斯洛伐克，我们看到了迫害犹太人的另一幅画面。迪克讲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丹麦和保加利亚的“拯救犹太人”事迹，也描述了一些个人和集体英雄主义的事迹，包括犹太人零星的抵抗，但整体感觉是压抑的。欧洲人例行公事一般地识别、抓捕、虐待、转移、迫害、看守和处决犹太人，通常他们不需要任何命令就会行动，更别提有德国人的胁迫，他们会怎么做了。有些人是出于贪婪和欲念，有些人是出于反犹情绪和民族主义的愤恨，还有些人仅仅是因为似乎看到机会就摆在眼前。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欧洲和欧洲人没有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罪名全都怪到希特勒和纳粹的头上，是轻而易举的。而对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苦涩中也还有些许安慰，因为在大屠杀近7



0年后，新的纪念馆在欧洲大陆各处拔地而起，纪念和哀悼曾经生机勃勃、别具一格的欧洲文明的逝去，一去不返。

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和平，也没能缓和战时社会政治变革带来的剧烈震荡，纳粹统治和抵抗行动遗留的阴影挥之不去。战争的惯性是很大的，战时对战后的影响比战前对战争的影响深远得多。在很多国家，例如波兰、拉脱维亚、法国、乌克兰和意大利，纳粹撤退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内战，在一些东欧国家，内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希特勒在战争中释放出反犹太主义大地震，战争结束后，屠杀和迫害犹太人的余震冲击了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地方。而捷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些东欧国家的人似乎从纳粹的种族清洗中吸取了经验，他们残忍驱逐了在当地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德国人。根据同盟国1945年7月和8月在波茨坦（Potsdam）的决定，作为对德国的惩罚，大约1 300万在境外居住的德国人被遣返回国，加上消灭犹太人的行动，永久地改变了东欧的社会和政治格局，文化尤甚。

跟随迪克的视角看完这段历史，尽管很多罪魁祸首在战后都因自己的罪行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但全盘来看，有股不公正感强烈袭来。在重获新生的欧洲，无论是法国、比利时、挪威还是南斯拉夫，自发进行的报复似乎并没有把矛头对准犯下罪行的实际合作者和压迫者。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妇女被剃了头，或是遭到侮辱和虐待，理由往往是她们和德国士兵发生过关系，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有时候这些女人仅仅是为了活下来，或是为了让家人有口饭吃，有片瓦遮头。还有成千上万完全无辜的挪威婴儿，仅仅因为父亲是德国士兵，就被战后的挪威政府拒绝给予公民身份。但是，一些重要的纳粹罪犯却逃到南美，从而逃过了刑事司法，甚至还被招募到苏联、英国或美国的

军事机构。“冷战”的开始，意味着无数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成为战后铁幕<sup>[6]</sup>两边警察和民事部门的座上宾。

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bunal）为审判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开了先河，但是也忽略了战胜国的一些罪行，最突出的就是苏联，至于有意无意，那就心照不宣了。毫无疑问，司法正义是胜利者说了算。很难想象，如果反过来结果会怎样。即便如此，也只剩一小撮纳粹犯罪分子受到指控，被处以绞刑，那也是因为这些人的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总而言之，迪克在提醒我们，纽伦堡审判和欧洲大陆进行的其他数千场审判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正义，但也让欧洲公民陷入一场困境，正如他们在战时处理道德问题时的左右为难一样，在战后，他们一边起诉战争罪犯，一边又要尽力重建战后的社会和政局，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实属不易。历史向来是不完美的，即便如此，“历史”本身也许是众生寻求正义的最佳工具。但是，要发挥历史的这项技艺，就要准备好接受模糊不清和人类行为的不完美。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理解受害者、肇事者和夹在中间的人所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尊重事实原本的样子。就这点而言，伊斯特万·迪克是大师级的工匠。每个研究“二战”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诺曼·M.奈马克

斯坦福大学

---

[1] István Deák, *The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18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I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István Deák,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eds.,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István Deák, *Essays on Hitler's Europ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1).

[4] Holly Case's interview with Deák, available online: <http://ecommons.library.cornell.edu/handle/1813/34132>

[5] Vichy — —

[6] Iron Curtain — —



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源自一个年轻匈牙利记者的死，他叫贝拉·斯托拉（Béla Stollár）。匈牙利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盟友，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匈牙利法西斯“箭十字党”<sup>[1]</sup>武装分子在一次枪战中将贝拉杀死，那是1944年的平安夜。贝拉是我姐姐的未婚夫。他所属的那个组织主要由逃兵以及从强制劳动的企业里逃出来的犹太人组成，贝拉被杀的那天，还有大概六名成员同他一起死去。由于贝拉从来都不是地下共产党的成员，甚至，他也从未掩饰过对共产主义者的厌恶，后来到了共产党统治时期，只有布达佩斯（Budapest）中心一个逼仄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作为纪念。这条街道就是他遇难的场所，可到了后来，就连这条小街也被新起的政府大楼一分为二。在今天的匈牙利，几乎没什么人记得他的名字，即便这个国家的反纳粹抵抗运动也变得微不足道。只有在耶路撒冷，2003年，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Museum）授予贝拉“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称号，这个荣誉称号是为了表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贝拉·斯托拉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他们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随之而来的，是我姐姐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我们家对失去保护伞的担忧，以及我因为一位“智慧的老友”凭空消失而生出的悲痛，对当时18岁的我来说，年仅27岁的他算得上“老友”了。直到几十年后，

我才明白，在这看似简单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历史问题，那时我才心甘情愿拾起这个主题。事实上，在贝拉·斯托拉的悲剧里，我们发现了战时合作、抵抗和报复的诸多矛盾性。他和同伴到底为什么而牺牲？他们的目标值得这样的牺牲吗？他那个组织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那些仅仅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但是，斯托拉和朋友们还计划夺取邻近的一个报社大楼，而苏联红军当时已经包围了布达佩斯，很快就要打到这里。如果这个城市得到解放，他们希望自己创立的是城里第一份自由、民主但绝非共产主义倾向的报纸。可是当时主要军队正在巷战，创立任何东西的概率又有多少呢？这份报纸又能独立运作多久，然后就落入共产主义者之手，或是被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禁止？

还有，难道我们不能说与他们对立的箭十字党党徒也是一样在为理想而奋斗，是为了某项事业甘冒生命危险吗？虽然这个事业并不值得。事实上，箭十字党的人大多是土匪流寇，他们不在前线和苏联红军拼死作战，而是去搜查、抢掠和杀害犹太人。而那些“局外人”呢？比如大楼管理员和他的妻子，他们被指控窝藏抵抗分子，就地枪决。或是毫无干系的一对夫妇，恰好在那个时候来拜访管理员，也被枪决。又比如十几个恰好藏在这栋大楼里的犹太平民，如果没有这个意外，他们或许就不会被发现，也能免遭伤害（苏联红军三周后就会攻下这个地区）。我们怎么看这些局外人？有多少无辜的局外人被抵抗活动卷入了漩涡，构成相当大的“附带伤害”？

和贝拉·斯托拉的一生和牺牲所纠缠的“职责”问题，给了我更多启示。在这起事件中，究竟有谁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又是向谁负责？上帝？国家？政府？正义？人性？斯托拉本是一介平民，在战时

被征召入伍，作为一名出色的体育记者和顶级速记员，他在国防部获得了中士的军衔。在那里，他接触到的文件和武器让他能给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假证件，并创建了一个看似合法的抵抗组织，但后来被出卖。按照律法，他是一名叛变者和卖国贼，但是，他实际上是想挽救匈牙利首都的一栋重要公共建筑，使其免遭破坏，如果这个城市的军事防御遭到全面破坏，获益的只会是德国人，而非匈牙利人。

在希特勒口中的“布达佩斯堡垒”里，有近4万名匈牙利战士被围困。他们和斯托拉一样向军队宣誓效忠。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躲了起来，穿上平民的衣服，还有的人因为害怕被处决不敢擅离职守。不过，很多军官和士兵都相信，只要他们还继续战斗，就是在恪尽职守，甭管这场仗是不是打得毫无用处，且注定失败。

当时，匈牙利政府是不是就应该能想到，会有军人和平民起来反抗？1944年12月24日，匈牙利一大半国土已经落入苏维埃之手，亲纳粹政府也已经逃离都城。德国部队自1944年3月起占领匈牙利，而旧时的匈牙利皇家军队此后一直是德国的坚定盟友。与此同时，在苏维埃最高指挥部的帮助下，临时国民议会在一个匈牙利东部城市成立，并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该政府于12月23日请求与苏联达成停火。这一消息通过电台传递到被包围的布达佩斯。坦白说，两个政府都不合法，一个是由纳粹党卫军在10月策动政变后成立的政府，另一个是由苏维埃红军组织成立的政府。之后，在共产主义者的统治下，只有“坚定地与法西斯主义为敌”才能算爱国主义者，到了今天，在信奉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的保守派统治下，公众和法律的天平却倒向了另一边，似乎共产主义才是敌人。

据我所知，后来并没有人因为斯托拉被杀那件事受到调查，更没有人因此被判刑，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生命轨迹与死亡，带给我的只有负面启示。贝拉·斯托拉礼貌谦逊，才华横溢，很有教养，他对我的成长和作品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坦白说，我从未想过要效仿他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

1948年，也就是匈牙利解放三年后，战后的民主联合政府遭到政府内的共产主义者严重破坏。彼时，我成功策划去了法国，我隐隐感觉到，很快就没人能离开了，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巴黎是一个年轻东欧人的梦，那是属于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的城市，是“存在主义”的温床，不过，说来也奇怪，在法国很多人把存在主义解读为无须洁净的意思。我当时住的旅馆房间一个月租金是五美元，想要洁净那是不可能了。事实上，当时我在法国的生活被各种阴影笼罩：政府危机，印度支那战争，看起来险象环生的共产党夺权战，还有关于战时合作和抵抗的记忆，以及战后的“大清洗”。我原本打算在巴黎大学<sup>[2]</sup>重启对中世纪历史和地理的研究，但在那里，和别人的交谈让我明白过来，在战争时期就已经有人“完成了所有研究”。在战时，的确有很多真正的英雄为人称道和崇敬，但也有些人是自我矛盾的，先是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接着又反抗德国人，后来又与其他法国人对抗，到了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去惩罚战争罪犯，他们这样做往往是为了转移视线，掩饰自己的罪行。而我的难民生活也是这样毫无定数：穷困潦倒，食不果腹，中间还被拉去从事非法体力劳动，偶然之中，又得到美国救济组织的意外援助。

在巴黎大学的半工半读还是有收获的，只是，这里的大多数讲座都是些知名的老人在课堂上大声念笔记，而这些笔记的印刷版，在教室前面随处可以买到。而最有挑战性的还是期末考试，他们对突出的事实性知识和无可挑剔的法语有着近乎无情的执念。那些通过考试的人姓名会被张贴在墙上，他们将拿到文学学士学位，一切皆成定局。无论如何，我心心念念通往法国学术殿堂的大门在我眼前关上了，拿不到工作许可，也拿不到在法国长期居留的许可，身为难民的我陷入泥淖。作为一个非本国出生的人，我也别指望能去公立高中执教，在法国，除了公立高中，其他类型的高中屈指可数。

多亏了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国际协议，我们这些没有护照的难民也可以出国甚至在国外打份临时工，比如到英国采收土豆，只是英国的贫困令人咋舌。当时法国有一份名为《战斗》（*Combat*）的报纸，在“二战”时期曾顽强抵抗，我在这份报纸从事了一些非法记者工作后，便向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申请了职位，并获得通过，一开始我只是个档案管理员，后来当了编辑。而我也得以在位于慕尼黑的两所大学里上一些课。这里的生活依旧艰难，后来出现转机，我们这些从德国以外招聘来的员工当中，有些人尴尬地享受着美国占领军军官的大量特权。这家由美国出资建立的“冷战”电台组织让我们能向东欧地区播放节目，归根到底，东欧人民在本国听到的只有谎言，别无其他，这家电台对他们必定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份工作却让我在匈牙利的可怜家人处境艰辛，所以，在1956年，我就利用这一机会移民去了第一个愿意接受我为永久居民的国家：美国。



在巴黎的时候，我曾是加里·戴维斯（Garry Davis）的超级粉丝，他在“二战”时担任美国轰炸机飞行员，1948年前后，他宣布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还试图到美国大使馆上交护照。戴维斯邀请其他人注册为“世界公民”，我们两万人都满腔热血地去做，当然，最后只是徒劳。世界绝不是“大同的”。但是，在我到达纽约之后，一个温暖的夜晚，在曼哈顿的一个小超市里，我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在这个超市里，没有人能说出一句像样的英语，但是没人在意，从那时起，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自在。

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凭着在布达佩斯、巴黎和慕尼黑拿到的一堆稍欠火候的文凭，我以历史系研究生的身份被哥伦比亚大学接纳，而学校登记处坚持要求我写明种族（“高加索人”）和宗教，不过后者很快得到“特许”，而写明种族这一条最终也被禁止。后来为了“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种族这一条又被起用。

自此，我拥有了绝对的人身自由，还有了无可争辩的特权地位，我甚至开始正视我身上倍添焦虑的巨大矛盾性：我的“闪米特人”<sup>[3]</sup>祖先和严格的罗马天主教教养。我想把这矛盾的两面统统都忘掉，却总也做不到，因为，无论是过去在布达佩斯的时候西多会修士（Cistercian）教给我的，还是现在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我体会到的，或是通过其他渠道认知到的，都是关于大屠杀（Holocaust）的记忆。大屠杀，过去是个无人知晓的词汇，乏人问津的问题，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球性主题。

在过去60多年里，哥伦比亚大学在很多方面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权力架构还是教学方法。但是，大学却很明确地朝着性别

平等和国际化的方向前进，只有一些美国少数族裔没能从中获益。迫于一些温和的压力，我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欧历史转为现代中东欧。当时，全世界都对“苏联集团”（Soviet bloc）内部的事态发展极为感兴趣。从那时起，我的研究重点就在以下几个主题之间切换：魏玛共和国的文化政治、1848—1849年的匈牙利民族革命、统摄多国的帝国之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军队军官团。奥匈帝国军队由来自11国的军人组成，我相信，军官们也来自11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里，中欧人能在一起安居乐业，兴盛繁荣，就得益于军官团的存在，而且作用超过普遍预期。就连北约（NATO）的将军们也想听我说说这个主题，因为他们想打造一支泛欧洲军队。不过，这支军队还没影儿。

研究维也纳和其他军事档案馆里卷帙浩繁的军官档案，对我来说是一大乐事，里面的信息详细得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还有很私密的部分。我向所有人推荐这类社会历史分析。

我能做到这些，多亏了我的美国新家庭作为后盾，还有一个肯支付我薪水福利的大学，即使遇到经济危机，或者学生抗议，也从未间断过，总是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心意授课。何其幸运！

在序言的最后，我想感谢那些让这本书得以问世的人。首先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50多年前，我以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为主题写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他的精心点拨和指导。冯·奥西茨基是德国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殉道者，193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彼时他被关在纳粹监狱，1938年逝世，去世时还在纳粹的监禁之下。我还要感谢《新共和》的编辑里昂

·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和《纽约书评》的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过去几十年里，在他俩的邀约下，我写了一百多篇书评，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二战”的书。其间，我与一些评论员在这两份伟大的杂志上“以文会友”，很是激动人心。里昂·维斯提耶本人也是个多产的作家，而罗伯特·西尔弗斯可以说是世上最严苛的编辑，他不仅熟谙新书的各种主题，还会和评论员切磋，连一个逗号都不放过，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世界历史中的关键问题，也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还要感谢两位杰出的当代欧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和扬·T.格罗斯（Jan T. Gross），他们非常好心心地让我参与准备了很多以“二战”后的欧洲为主题的会议，部分会议是由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其已故所长克日什托夫·密切尔斯基（Krzysztof Michalski）赞助的。我还与托尼以及扬合作编写了一套关于战后欧洲报复性政治的文集，面世后很成功。

我还要特别感谢巴林特·毛焦尔（Bálint Magyar），他把自己1971年在布达佩斯大学读书期间写的一篇珍贵论文给了我一份，供我使用，这篇论文是关于匈牙利自由运动（Hungarian Freedom Movement）的，而贝拉·斯托拉的“克罗提德街组织”（Klotild Street Group）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1996—1998年期间，巴林特·毛焦尔担任匈牙利的教育部长。

还有很多人帮我集思广益，让我能有条不紊地写下这些思路，我按照字母顺序罗列出其中一些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读了我的手稿，给我指正，还有些人在我写某些章节的时候再次给了我灵感和启示。他们是：塔里克·阿玛尔（Tarik Amar）、盖尔盖伊·拜伊克斯（Ger

gely Baics)、乔鲍·贝克斯(Csaba Békés)、沃克·博格翰(Volker Berghahn)、皮特·布莱克(Peter Black)、萨莉·卡尔(Sally Carr)、霍利·A.凯斯(Holly A. Case)、迈克尔·查德(Michael Chad)、马泰亚·费杰特(Mateja Fajt)、詹妮弗·福雷(Jennifer Foray)、蒂博尔·弗兰克(Tibor Frank)、本·弗罗默(Ben Frommer)、查尔斯·加蒂(Charles Gati)、埃米莉·格瑞保(Emily Greble)、保罗·哈尼林克(Paul Hanebrink)、皮耶特·贾德森(Pieter Judson)、拉斯洛·卡赛(László Karsai)、安德鲁·考恩布鲁斯(Andrew Kornbluth)、凯瑟琳·雷柏(Katherine Lebow)、安·马约尔(Ann Major)、桑福德·马尔特(Sanford Malter)、马克·马绍尔(Mark Mazower)、丹·麦克米伦(Dan McMillan)、朱迪思·米勒(Judith Molnár)、伊娃·D.佩克(Éva D. Peck)、汤姆·佩克(Tom Peck)、阿提拉·波克(Attila Pók)、伊万·桑德斯(Ivan Sanders)、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András Simonovits)、米蒂亚·维利科尼亚(Mitja Velikonja)和南希·温菲尔德(Nancy Wingfield)。

一开始,我对如何撰写教科书也是一头雾水,所以非常感谢普丽西拉·麦克吉亨(Priscilla McGeehon)领我走进这扇大门,我还要特别感谢美好的凯利·费林吉姆(Kelli Fillingim)和她的同事维多利亚·亨森(Victoria Henson)、桑德拉·贝里斯(Sandra Beris)和安妮特·温达(Annette Wenda)。

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的德尔斯·杰里·格利克里奇(Drs. Jerry Gliklich)和布雷特·塔贝克(Bret Taback),是他们的妙手仁心,让作者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的体魄来写作。

我亲爱的妻子格洛丽亚·迪克（Gloria De ák）一边写自己的书，一边还倾力助我。

如果这个国家因此多一些人对此类话题产生兴趣，譬如外国占领下的生活、一个公民对占领者与同胞的责任以及战时受迫害的人如何因为别人的一点同情而得到帮助，那我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

伊斯特万·迪克

2014年于纽约

---

[1] Arrow Cross 1936 “ ” 1944 10 15 1945 4

[2] Sorbonne 1257 1261 “ ”

[3] Semitic



20世纪初期和中叶落入希特勒统治下的国家经历过武装冲突、外国占领、空袭、迫害和集中营，还有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残酷内战和种族战争。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从挪威位于北极圈内的一端一直延伸到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从法国加来港（Calais）延伸到高加索山脉（Caucasus）的最高峰，要概括起来是件难事。如果以此为边界，圈起来的土地上所到之处都有大量士兵和警察，数量之众，足以统治这片土地，但还不足以控制每一个城镇、村庄和每一片森林。德国人的存在已经无可避免，因此出于种种原因，国家政府、地方机构、本地居民、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以及许多个人，都在极力容忍德国人踏足自己的祖国，统治着他们，有的还积极与之合作，有的则会起来反抗。例如，法国的一些大实业家基本上都在竭力为德国的战争行动服务，并从中牟利，但是数百万的法国年轻人却很痛恨并抵制被带到德国去强制劳动。其他人，比如法国的作家、诗人、演员、艺术家和记者就分成两派了。究竟是被动顺从，主动合作，还是奋起抵抗，主要还得看他们做选择的时机和地点了。后来局势出现最重大的转折，与其说是因为本土的进展，不如说是因为1942—1943年冬天苏联在伏尔加河（Volga River）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胜了德国第六集团军（German Sixth Army）。遥远的战事，

让数百万欧洲人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顺从或合作，转而强力反抗纳粹，而且越来越坚定。<sup>[1]</sup>

在整个欧洲，只有两大族群没能在顺从、合作或抵抗中进行选择。其一是波兰人，德国占领者除了需要他们打理政府和警察事务，尤其是抓捕在逃的犹太人之外，没给他们任何机会进行政治或军事上的合作。另一个群体，不用说，就是犹太人，希特勒已经对他们集体宣判死刑了。不过，纳粹眼里的第三大敌人——俄罗斯人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虽然数百万俄罗斯人被杀，其中有战俘，还有的仅仅是无辜的平民，但还有成千上万俄罗斯人获准在德国武装部队工作，他们也愿意这么做。

欧洲人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被动顺从的，但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画风可就不同了，他们试图利用德国人的存在为个人或组织的未来保驾护航。他们还借此机会来清除本国的敌人，无论是武装组织，还是犹太人这样走投无路的受害者，都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本书想呈现的是，尽管德国的征战是欧洲政治和社会巨变的根本诱因，但战争与德国的踏足，并不是那些年里席卷欧洲的社会动荡与革命的唯一原因。

同样，如果从“二战”中只看到了德国士兵征服欧洲，认为他们后来被同盟国赶走之后，欧洲人的生活差不多又恢复正常，那就错了。也许对于少数幸运的西欧和北欧国家来说，情况的确如此，但在别的地方，并非只有德国在攻城略地。那些年里，苏联攫取了欧洲大片土地，还有德国的盟友也是，包括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因此，很多国家，至少东欧的那些国家是屡次被占领，不是两次，而是三番五次。这些地方的人民不得不一次

次在顺从、抵抗和合作中做出选择。就拿今天的乌克兰城市利沃夫（Lviv，过去曾用过的名字有伦贝格 [Lemberg]、里沃夫 [Lvov] 和罗乌 [Lwow]，主要看这座城市掌控在谁的手中）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前，这里的人说自己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陛下的忠实臣民，是很有好处的；同理，1918—1930年，要说自己是波兰爱国主义者。但是到了1939—1941年，生存的本能指引着他们把热忱和忠诚奉献给了苏联和约瑟夫·斯大林。然而1941—1944年，得罪德国纳粹又变成生死攸关的大事了。1944年之后，利沃夫人再次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利沃夫现在属于乌克兰，但是“二战”结束时，很多当地居民都已惨遭杀害或是被驱逐出城。事实上，到了1945年左右，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几乎都走光了，填补空白的是乌克兰人和从苏联偏远地区来的移民。）

在瓜分土地的同时，这里上演着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我们看到的主要就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sup>[2]</sup>，但不限于此。这个“最终解决方案”试图让一个大约900万人的族群从地球上消失。事实上，到了战争尾声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希特勒的欧洲存活下来，换句话说，接近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被杀害，这背后有两个相互交织的原因，一个是德国人及一众欧洲帮手们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冷酷决心，另一个就是同盟国的胜利和一些欧洲人的人道主义冲动。所以，我们会仔细探究德国的盟友政府以及其他民族、群体和个人在“犹太问题”上与德国纳粹合作和反抗的各种形式。在那个时期，决定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复杂游戏背后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支持或反对纳粹（National Socialist）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点，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象的。除此之外，在整个战争中还有一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比如芬兰和保加利亚，希特勒的命令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力，还有更广大的一片土地，比如德国占领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和南斯拉夫部分地区，这里的武装游击队一次又一次地把德国部队赶出去。

虽然“顺从”或“被动顺从”这样的字眼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这个词也足以形容希特勒统治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至于这个词的定义，这里却无须赘言了。很显然，有些人想在外国占领下过活，想在战争中毫发无伤地活下来，想保持政治中立。他们从内心里抗拒合作和抵抗，因为这是可能带来危险的举动。对很多欧洲人来说（即使不是大多数），合作者都是一群极端狂热分子，一心想让你的儿子加入纳粹党卫军（Waffen SS，纳粹组织的作战部队），到俄罗斯前线作战，或是去德国工厂劳动，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热分子，可能是一些衣衫褴褛、让人倒胃口的外国人，做些破坏列车运行的事，想拉你的儿子去森林作战，到时候，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说不定还会被德国人或敌对的游击队杀死。

顺从的本质和特征变化多端，界限也无定数。如果你在一个为德国生产枪械的工厂努力工作，该如何评判？如果你干得很糟糕，又该如何评判？是否前者就算合作者，而后者就算抵抗者，中庸的那些人

就算顺从者了？而你的工程师同伴和你的工作可能对德国的战备物资生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又该怎么看？

还有一些人，在德国占领时期继续从事他们在和平时期的无害职业，比如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或是蜚声世界的法国歌手、演员莫里斯·切瓦力亚（Maurice Chevalier），又该如何评判？除了在巴黎的舞台上表演，切瓦力亚还常常在德国士兵面前表演，或是前往位于德国的法国战俘营，与德国记者交谈，为可怜的战俘歌唱。这等于是给德国做了绝妙的宣传造势，结果纳粹和法国抵抗者都把切瓦力亚看作合作者，只不过前者指的是与自己合作，后者指的是与敌人合作。战后，他被指控叛国罪并受到审判，结果宣判无罪，即便如此，美国和英国仍然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

还有，表现顺从也因地而异。比如英吉利海峡群岛，1940—1945年被德国人占领，士兵手脚干净，无可指摘，在这里顺从占领者比较容易。而俄罗斯被占领的地区，顺从起来就比较难，德国人及其盟友常常烧毁村庄，赶走或杀死所有的牲畜，还对人进行扫射。在占领者很少或压根没有占领者的地方，适应德国占领也相对容易。只不过，在希特勒的欧洲，究竟有多少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遇到过一个德国士兵或警察，这种数据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版本。

虽然很多局外人竭力保持中立，但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无法逃脱命运这回事。有些人被德国人扣押并杀害，有些人在游击队袭击德国士兵的混乱中被无辜波及而丧命，还有些人被当地的狂热分子逼迫选边站，还有些人因为没有影响力或关系，两边都受排挤，得不到救济，就活活饿死了。

“二战”时的欧洲，没人能全身而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对安乐的丹麦生存比在波兰要容易得多，德国人用温和的手腕对待丹麦居民，而在波兰，不夸张地说，没有谁逃得过占领者的雷霆手段。更有甚者，占领波兰的德国人和苏联人都热衷于一边消灭知识分子，一边残酷压榨其他阶层。

本书将要呈现的就是战时五花八门的合作和抵抗形态。拿合作来说，简单点的，比如给一名口渴的德国士兵递上一杯水，升级版的，比如支持盖世太保（Gestapo）——德国秘密警察中最可怕的一支部队——手段各异，谴责、追捕、折磨和杀害可疑和真正的抵抗者，合作形态不一而足。而抵抗的形态也是花样上演，包括佩戴爱国主义徽章并藏在翻领下面，以及参加游击队去殊死搏斗，这也是成千上万南斯拉夫人、波兰人和苏联人的真实写照。但还有很多问题至今无解。比如我们该如何评判黑市？黑市虽然削弱了德国人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但同时也夺走了穷苦人家的生活物资。面包师要求加薪的一场罢工算不算抵抗行为？说起来，这种罢工对同胞的伤害其实超过了德国人，因为市面上仅有的面包都归了德国人。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以上所述不过是一团乱麻的线头而已。穿着蓝色制服的波兰警察算合作者还是抵抗者？工作日，他们追捕藏匿的犹太人，交给德国警察，但到了周末，他们就和反纳粹的同伴见面，商议着要去炸掉一列德国军用火车。匈牙利的矿工又该如何评判？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属于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1940年10月发起针对犹太人矿主的大罢工，要求加薪。他们这一举动间接妨碍了匈牙利重工业工厂为德国人生产武器，而工厂老板是犹太人。罢工是由匈牙利纳粹头子主导的，但最终应德国政府要求，被匈牙利军队粉碎。

可以肯定的是，时机很关键，前线战局的变化让合作者转为抵抗者，不过也有很多人其实是身兼两职。毕竟，如果你想在诺曼底登陆（Normandy invasion）的时候对德国交通运输系统造成大型破坏，你得是一个深得德国人信任的法国铁路高层员工。

以上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真正的反纳粹斗士，漫长的战争中，还是有人自始至终都以命相搏，为自由、民主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而战。也有人在效忠希特勒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到了战争末期，1945年4月，纳粹党卫军中成千上万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法国的年轻志愿军为了守住柏林的总理府地堡入口而殒命。

至此，有一点应该已经明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恰当定义“合作”与“抵抗”，还有，某些特定群体和个人应该划归到哪个范畴下。还有一点，西欧和南欧这片土地，与东欧和东南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尽管德国纳粹党卫军在法国和意大利犯下残酷暴行，但基本都是在反纳粹斗士的挑衅之下发生的。总的来说，比起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滔天罪行，德国在西欧的战争罪行相对克制。在波兰、巴尔干国家、苏联沦陷地区、希腊和南斯拉夫，大量游击队的挑衅激起了德国人的愤怒。在这些国家，纳粹党卫军和德国军队，也称国防军（Wehrmacht），杀人有时是为了找乐子，或是改变当地的种族结构。欧洲大陆似乎上演着两种战争：西边是一场传统的战争，而东边，是大规模的德国殖民和针对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德国人眼中劣等民族的种族“十字军东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西边的战争始于1939年，止于1945年，而东边的战争虽然开始得晚一些，1945年之后却仍在延续，主要是反对苏联征服者的武装斗争和东欧人内部的血腥冲突。比如，在波兰，最后

的反共产主义武装抵抗分子死于1963年。更显著的是，“二战”在东边留下的最持久的负面影响是种族清洗，而在西欧，除了德国人在本地人不同程度的帮助下实施的犹太人大屠杀外，没有发生什么种族清洗。

在“二战”中，有些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德国军队和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的其他代理人手中，而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讨在这些国家的合作、抵抗和报复问题。这些国家就包括捷克（当时叫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现在叫捷克共和国）、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巴尔干国家和苏联部分沦陷地区。<sup>[3]</sup>但“二战”时的欧洲不止有纳粹德国和德军占领的国家，还有一大帮政治独立的德国盟友：芬兰（严格来说，只能算参战友国，不算盟友）、意大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元首、部长、外交、军队、警察和行政管理部门。（一些沦陷的国家迫切希望被希特勒接纳，成为其盟友，但不过是白费力气，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傀儡政府。）

在那些与德国联合或结盟的国家里，个人在反纳粹群体里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不过他们纠结的并不是应不应该服从德国人，而是应不应该服从自己的政府，德国人毕竟山高皇帝远。确实，这些政府表面上与德国达成口头的结盟，但他们对纳粹的忠诚值得怀疑。事实上，无论今天大量的史书和电视节目怎么描述，这些盟国政府里没有一个是希特勒的傀儡。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意愿。希特勒的盟友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追随德国的领导，或者追随到什么程度。当他们拒绝德国人的要求时，德国人往往也无能为力。

这就意味着，在这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里，个人或组织如果遵从政府的指令，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或推动或损害德国的事业，关键还是要看地点、时间和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了。难怪在战后审判中，这些国家被罢免的领导人受到的指控通常不是通敌罪，而是叛国罪。

在战时欧洲还有第三类国家，也就是少数中立国，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也因时间、地点和各自政府的利益而不同。讽刺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体系与意大利和德国的颇为相似，但这两个国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采取高度谨慎的政策。另一边，民主的瑞士和瑞典与纳粹势力地缘相接，这两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支持德国的军工业，至少在战争头几年是如此。不仅如此，与德国合作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

这些事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引人入胜，就是因为“二战”期间合作与抵抗的浪潮都是前所未有的，给德国占领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毁灭，但至少也让其中一些国家实现了部分的自我解放。“二战”期间，自愿参与到冲突中的民众数量节节攀升，这是因为“二战”不同于“一战”，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撞，两边阵营都有信念无比坚定的政治斗士。结果，当战争结束，要开始清算的时候，一波前所未有的肃清行动席卷欧洲，数百万人成为报复的对象，还有数百万人成了报复的牵头人和执行者。据我估计，“二战”之后，每20个成年男子中就有1个因叛国罪、战争罪或通敌罪而受到刑事法庭的调查，实际上刑事法庭并不常常进行审讯和判决。有意思的是，这里面不少人因为战时的行为受到谴责，却也因为英雄主义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甚至有时还被授勋。比如法国的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

t)，战时忠诚地与德国合作，残忍迫害犹太人，令人发指，战后被判五年的“国家之耻罪”（dégradation nationale）。但是，他很快又被同一个法庭宣告无罪，理由是他“持续参与到反对占领者的抵抗运动”[4]。“二战”后的法国政府还原谅了与德国纳粹合作的警察局长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并一路擢升他到最高行政级别，但是，1998年，一个法国法庭判处帕庞长期徒刑，理由是他在德占期间犯下了战争罪行。[5]

再来说说匈牙利王国摄政（国王之位空缺）、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二战”期间，对于德国在匈牙利的影响力，他有时助纣为虐，有时从中阻拦，至于倒向哪边，就要看他如何判断战争形势和可能的结果，以及他那些亲近的幕僚中谁在他跟前说得上话。同样，对于本国的犹太人，霍尔蒂迫害过，也保护过，至于采取何种态度，就要看当时军事行动的风向和他治下那些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和融入程度了。最终，他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监禁，而是在斯大林的敦促下流亡葡萄牙。[6]

战后有多少国家元首、总理、内阁成员、军事高层、知识分子甚至诗人和演员在法庭受审，又有多少人被判以绞刑，说出来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实际上，一系列的肃清行动早已在战时就开始了。当时，在一些德占国家，在德国许可下成立的新政府指控本国的官员和政客罔顾德国威胁，没有采取防御措施。报复行动延续到战后，而在西方盟国或苏联的庇护下，规模更是上了一个台阶。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南斯拉夫，他们誓要根除战前的旧制度残余，旧制度下的通敌者和抵抗者都被视为腐败和失职的。他们希望，审判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更有社会良知的政府，多点诚信，少点腐败。

即使在战争肆虐的时候，通敌者和抵抗者都在玩味统一的欧洲这个概念，至于由谁来领导，纳粹德国也好，美英也罢，就另当别论了。总的来说，这一概念只是没有传到苏联人和共产党的耳朵里，他们觉得美国人会利用统一的欧洲来对付自己。如此说来，“二战”后的很多高见和问题其实在战时就已浮现，并有人在着手处理。讽刺的是，战争时期政治斗士设想的新欧洲最终得以创建，其背后的功臣与其说是战时的合作者和抵抗者，不如说是更为现实的政治家，前者很多在战时和战后已经被杀，而且通常都被认定为乌托邦式空想家，而后者在战时往往避免做出政治承诺。

在整本书中，我们会一再地直接和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欧洲人希望在战后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我们会发现，他们就很多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比如未来欧洲在世界的角色，欧洲大陆可能的统一，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属性等等。不过，有一点，数百万欧洲人都毫无异议，只是东欧人比西欧人更坚定而已，那就是一定要剔除各国的异己分子，包括外国占领者、移民、难民或本国的少数民族裔，尤其是犹太人。尽管他们不认同纳粹的手段，但还是有大量欧洲人都认同纳粹清除欧洲犹太人的计划，就连西欧也未能免俗。简而言之，如果说有那么一个重要的欧洲计划存在，这个计划就是种族清洗。

不得不说，相对于西欧、北欧和南欧，东欧和东南欧更为迫切地想要实施种族清洗。原因很简单，西欧和北欧在早先几个世纪就已经通过义务教育、强制服兵役基本完成了种族清洗，必要时还会强力执行，而东部的种族净化一直到1918年多民族帝国灭亡之际方才开始。



不过，在两次战争之间以及“二战”期间，仇外情绪在欧洲旧大陆蔚然成风。

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无论在哪里，个人都要面临效忠谁的艰难选择，只是具体的困境也因国别有着天壤之别。在丹麦，每一个政府机构，上至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下至地方警察分局，都在德国侵略中幸存下来，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是继续效忠傀儡政府，还是应该参加一些抵抗运动，到底哪种选择符合祖国的利益，并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福利。在意大利，1943年夏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国王和他的新政府在意大利南部转投同盟国阵营，德军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墨索里尼就此成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共和国。

当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分崩离析，意大利人不得不问自己，该向谁宣誓效忠：是逃到南部的国王，还是新的法西斯政府，抑或是四分五裂的反德游击队战士？游击队里分为不同阵营，包括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派和保守派。同时，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的德国部队一遇到意大利士兵就立即监禁或处决，没有半点迟疑，而在南部，美、英、法、波兰和其他同盟国军队正奋力将意大利从德国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对意大利城市和地标一顿狂轰滥炸。与丹麦人不同，“二战”期间的意大利人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社会和国家危机。

对于合作、顺从、抵抗和报复这四个相关主题，学界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研究。关于合作与抵抗的研究是有一些，从这四个主题中挑一个出来就特定国家展开研究的出版物也很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以法国、丹麦、挪威和低地国家为对象的作品。另外还有少量有用的文集。

但有些国家的合作却鲜少出现在学界的作品当中，而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类地方的合作为主题的作品压根儿不存在。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填补史料的空白，同时帮助大家认识到，“二战”时哪些行为是合作、抵抗和报复。当然，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事件不仅对欧洲、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本书如果涉及几十个国家，又试图从社会和个人层面去分析这些国家内纷繁的特定事态发展，那就不要指望这本书能包罗万象。我们没有全盘的统计数据，比如，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内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真实数量，更别提整个欧洲的数量了。我们也不确定有多少欧洲人在战后因为通敌罪或战争罪受到惩罚。即使我们有某个国家的准确数据，比如挪威，我们也没有苏联的任何可靠数据，所以结果也是此消彼长。但是，如果没有整个欧洲大陆的数据，所有的陈述不过还是老调重弹，一盘散沙。本书会举出一些例子，以期能够在读者脑海中呈现出一个全貌。

引言之后，本书会先简单回顾一下军事占领的历史以及占领期的暴行，这些暴行往往都是因为互不信任和对士兵平民的恐惧造成的。我们也会看看国际上如何尝试去控制敌军士兵在占领国的行为。接下来，本书会分析为什么在1939年，也就是“一战”爆发后第25年，世界会再次面临一场广泛的军事冲突。第二章的主题是德国早期的征服。1938年德军占领奥地利，在那里受到兄弟般的欢迎，似乎是他们将奥地利人从无政府状态中解救了出来。1939年春天，德国占领捷克，这被视为一场国家悲剧，但捷克人应该加以妥善利用，从而绝处逢生。到了1939年9月1日，波兰苦苦抵抗德国入侵，吹响了欧洲战争的号角。

第三章将呈现一个全貌，阐述西欧和北欧如何在德军猛攻下沦陷，以及这两个区域内很多国家一开始如何尝试与德军共存，甚至从中渔利。第四章会阐明德军在1941年6月对盟友苏联的袭击，这一点出人意料，至今令人费解，同时改变了所有的计划和预判。右翼的欧洲人一直痛恨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虽然他们对德国的事业心向往之，但希特勒与斯大林在1939年8月签订的协议却令他们止步，现在德国袭击了苏联，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向元首<sup>[Z]</sup>投诚，全心全意服务。而极左翼人士过去不得不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势力冲突”中保持中立，也就是说不介入纳粹德国和英法联盟之间的战争，现在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反法西斯斗争”中。这场战争瞬间演变成深刻的意识形态对立。

而对于东欧人来说，苏德战争几乎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在两个威胁重重的巨头的冲突中该如何自处。这些小国之间通常也是相互看不顺眼，彼此为敌，那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处境中，究竟谁是更大的敌人？第五章试图说明在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德国入侵苏联的行动代号）之后，德国众多盟友发现自己处境尤为艰难。

德军的第一次战败，时间是1941—1942年冬天，地点是莫斯科附近，鼓舞了那时还不显眼的抵抗运动，抵抗组织开始积聚力量、树立自信。这就是第六章和第七章的主题。在此，我们还是必须把西欧和北欧这一片土地与东欧和东南欧区分开来，因为从挪威到法国和意大利，反纳粹斗争和战后改革是抵抗者的坚定目标，而东欧和东南欧抵抗者的任务和目标就复杂多了。巴黎的抵抗者希望能恢复国家独立，惩罚叛徒，带来一个更美好公平的战后社会。而乌克兰利沃夫的反纳

粹斗士首先还要决定主要敌人是谁：德国占领者、苏联军队，抑或是比邻而居的犹太人或波兰人？但是，无论哪里的抵抗者，他们的生命都处在危险中，他们都要经历残酷的磨难。事实上，抵抗运动的英雄浪漫主义原来不过是好莱坞的题材，而非现实。第八章将会列举三个具体事例，说明占领者在抵抗运动的驱使下实施了哪些盲目的暴行。抵抗的主要受害者既不是占领者，也不是抵抗者，而是平民百姓。本书最后一章将会给出战后报复的具体事例，并尽力概括欧洲在解放中和解放后所经历的空前绝后的清算。战后清算的影响是双重的，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至今都没有被完全消化吸收。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二战”前的两个世纪里，国际社会就试图让战争更人性化，以防士兵抢劫和杀害被俘敌军，避免军事指挥官纵容手下大肆屠杀无辜平民。这样的努力当然不一定总能成功，战争期间的暴行还是会上演，比如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南非布尔战争<sup>[8]</sup>、殖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只有在1939—1945年，战争暴行、大屠杀和大规模驱逐在意识形态上找到了正当理由，还被视为普遍需要的。合作者与抵抗者的冲突本身就鼓动着他们回归到古老原始的野蛮习性，令人扼腕。但是，在战后，国际组织也试图执行更为强力有效的人道主义规则，有时候也能成功。尽管这些国际公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中被普遍忽视，但这种糟糕的情况终究还是特例。“二战”后，欧洲人基本上都会寻求国际组织来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酷刑和杀戮。所以，也可以说“二战”带来的不只是绝望，还有一大波希望。



st European Monographs,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7] Führer — —

[8] Boer War 1880 — 1881 189 9 — 1902 — —



1718  
18  
19

“”  
25

18  
18

1818

17722017  
94  
1920  
“”  
“Christ of the Nations”



西班牙内战期间1918—1939年1944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1940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

西班牙内战期间1792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La Marseillaise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1792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

西班牙内战期间1792—1824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guerrilla”西班牙内战期间“guerrilla”西班牙内战期间

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guerrilla”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

西班牙内战期间<sup>[3]</sup> 1814 —1815年西班牙内战期间<sup>[4]</sup> 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1950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

西班牙内战期间3—4年西班牙内战期间1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

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西班牙内战期间



國際法委員會在1978年通過的《國際法委員會關於國家責任的條約草案》  
中，將國家責任分為「絕對責任」和「相對責任」兩種。

絕對責任是指國家對於其境內發生的任何損害，不論該損害是否由該國政府或其官員的過失所引起，均應承擔責任。相對責任則是指國家僅在該損害是由其政府或其官員的過失所引起時，才承擔責任。這種區分在國際法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確定了國家在什麼情況下才需要對其境內發生的損害負責。

國際法委員會在1978年通過的《國際法委員會關於國家責任的條約草案》*Fourth Hagu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1907* 第42—43條中，明確規定了國家責任的歸屬問題。<sup>[5]</sup> 根據該條約，國家僅在該損害是由其政府或其官員的過失所引起時，才承擔責任。這種規定在國際法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確定了國家在什麼情況下才需要對其境內發生的損害負責。

國際法委員會在1978年通過的《國際法委員會關於國家責任的條約草案》中，將國家責任分為「絕對責任」和「相對責任」兩種。這種區分在國際法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確定了國家在什麼情況下才需要對其境內發生的損害負責。

法蘭西共和國軍隊中，有一類特殊的兵種，他們被稱為“法蘭西之盾”（francs-tireur）。  
 他們是法國軍隊中的精英，也是法國軍隊中最具戰鬥力的兵種之一。  
 他們在戰場上表現出色，是法國軍隊的中堅力量。

[illegible]

“ ” 1914 “ ”

1914年，加利西亞省（Galicia）的猶太人人口約為10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奧匈帝國對猶太人的歧視和迫害，許多猶太人被迫離開家園，逃往其他地區。戰後，加利西亞省被重新劃分，部分地區歸於波蘭，部分歸於烏克蘭。在波蘭統治下，猶太人繼續受到歧視，最終在二戰期間被大規模殺害。在烏克蘭統治下，猶太人也遭受了嚴重的迫害。加利西亞省的猶太人人口在戰後大幅減少，許多猶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或其他國家。

「大東亞」の概念は、19世紀後半から20世紀初頭にかけて、日本、ロシア、アメリカ、イギリスなどの列強国によって、東アジアの地域を指す言葉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概念は、Ottoman Empire（オスマン帝国）やYoung Turk（若きトルコ）などの国や民族を指す言葉としても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また、Syrian Desert（シリアの砂漠）などの地理的な地域を指す言葉としても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この「大東亞」の概念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を指す言葉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が、/（スラッシュ）の形で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った。この「大東亞」の概念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を指す言葉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が、/（スラッシュ）の形で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った。

Anatolia（アナトリア）は、小アジアの地域を指す言葉である。この地域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の一部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1919年、この地域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の一部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

この「大東亞」の概念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を指す言葉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が、/（スラッシュ）の形で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った。この「大東亞」の概念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を指す言葉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が、/（スラッシュ）の形で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った。

「大東亞」の概念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を指す言葉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が、/（スラッシュ）の形で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った。1928年8月27日、この地域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の一部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sup>[7]</sup> この地域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の一部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44年、この地域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の一部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5年、この地域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の一部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Attila the Hun（アッティラ）は、東アジアの地域の一部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があった。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中被迫放弃其在海外的大部分殖民地，并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还法国。这一条约不仅重塑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也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1936年，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这一举动严重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和《洛加诺公约》。1938年，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紧张局势。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波兰，随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

1940年5月，德国入侵法国，法国在六周内沦陷。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战争进入全球阶段。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

[1] Otto Schwarz, ed., *Strafgesetzbuch, Nebengesetze, Verordnungen und Kriegsstrafrecht*, 12th rev. ed., 7th German ed. (Munich and Berlin: C. 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43) §§ 335–338, 211 (1939) § 8 (1010–1012) (1012–1019).

[2] Martin Rittau, ed., *Militärstrafgesetzbuch*, in der Fassung vom 10 Oktober 1940 — mit Einführungsgesetz und Kriegsstrafrechtsordnung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Verlag, 1943), 99.

[3] Napoleonic Wars (1803–1815) (1789–1814) (1815–1815).

[4] Congress of Vienna (1814–1815).

[5] W. Michael Reisman and Chris T. Antoniou, eds., *The Laws of War: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Primary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Laws Governing Armed Conflic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232–233; Lester Nurick and Roger W. Barrett, "Questions of Guerrilla Forces Under the Laws of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0, no. 3 (1946): 563–583; Kenneth Macksey, *The Partisans of Europe in the*

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5), 17-18; and Major Richard R. Baxter, "The Duty of Obedience to the Belligerent Occupant,"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0): 235-255

[6] League of Nations 1920–1946

[7] 1928 8 27







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成为德国的一部分。这一事件被称为“奥地利合并”（Anschluss）。在合并之前，奥地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体系。然而，在1938年3月，德国军队入侵奥地利，并迅速占领了该国。德国政府宣布奥地利是德国的一个省份，所有奥地利公民都成为德国公民。这一合并极大地增强了德国的军事实力，并为德国在欧洲的扩张铺平了道路。

在奥地利合并之后，纳粹德国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许多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并被限制从事某些职业。一些犹太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如达豪（Dachau）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这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用来关押政治犯、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的地方。在奥地利，许多犹太人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等待被运往其他集中营或送往灭绝营。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许多犹太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如达豪（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这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用来关押政治犯、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的地方。在奥地利，许多犹太人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等待被运往其他集中营或送往灭绝营。

1938年11月，纳粹德国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迫害。许多犹太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如达豪（Dachau）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这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用来关押政治犯、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的地方。在奥地利，许多犹太人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等待被运往其他集中营或送往灭绝营。



**Ruthenes**

**Rusyns**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1938年100年

1938

1938年，捷克斯拉夫共和国被德国和匈牙利占领，斯洛伐克成为德国保护国。斯洛伐克人开始组织抵抗运动，但遭到残酷镇压。许多斯洛伐克人被迫加入德国军队，为纳粹德国作战。

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开始重建国家，但苏联红军在斯洛伐克犯下了许多罪行，包括大规模屠杀和掠夺。斯洛伐克人开始组织抵抗运动，但遭到残酷镇压。

1948年，苏联红军占领捷克斯拉夫共和国，斯洛伐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斯洛伐克人开始组织抵抗运动，但遭到残酷镇压。许多斯洛伐克人被迫加入苏联军队，为苏联作战。斯洛伐克人开始组织抵抗运动，但遭到残酷镇压。许多斯洛伐克人被迫加入苏联军队，为苏联作战。

1938年，斯洛伐克成为德国保护国。斯洛伐克人开始组织抵抗运动，但遭到残酷镇压。许多斯洛伐克人被迫加入德国军队，为纳粹德国作战。斯洛伐克人开始组织抵抗运动，但遭到残酷镇压。许多斯洛伐克人被迫加入德国军队，为纳粹德国作战。

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开始重建国家，但苏联红军在斯洛伐克犯下了许多罪行，包括大规模屠杀和掠夺。斯洛伐克人开始组织抵抗运动，但遭到残酷镇压。许多斯洛伐克人被迫加入苏联军队，为苏联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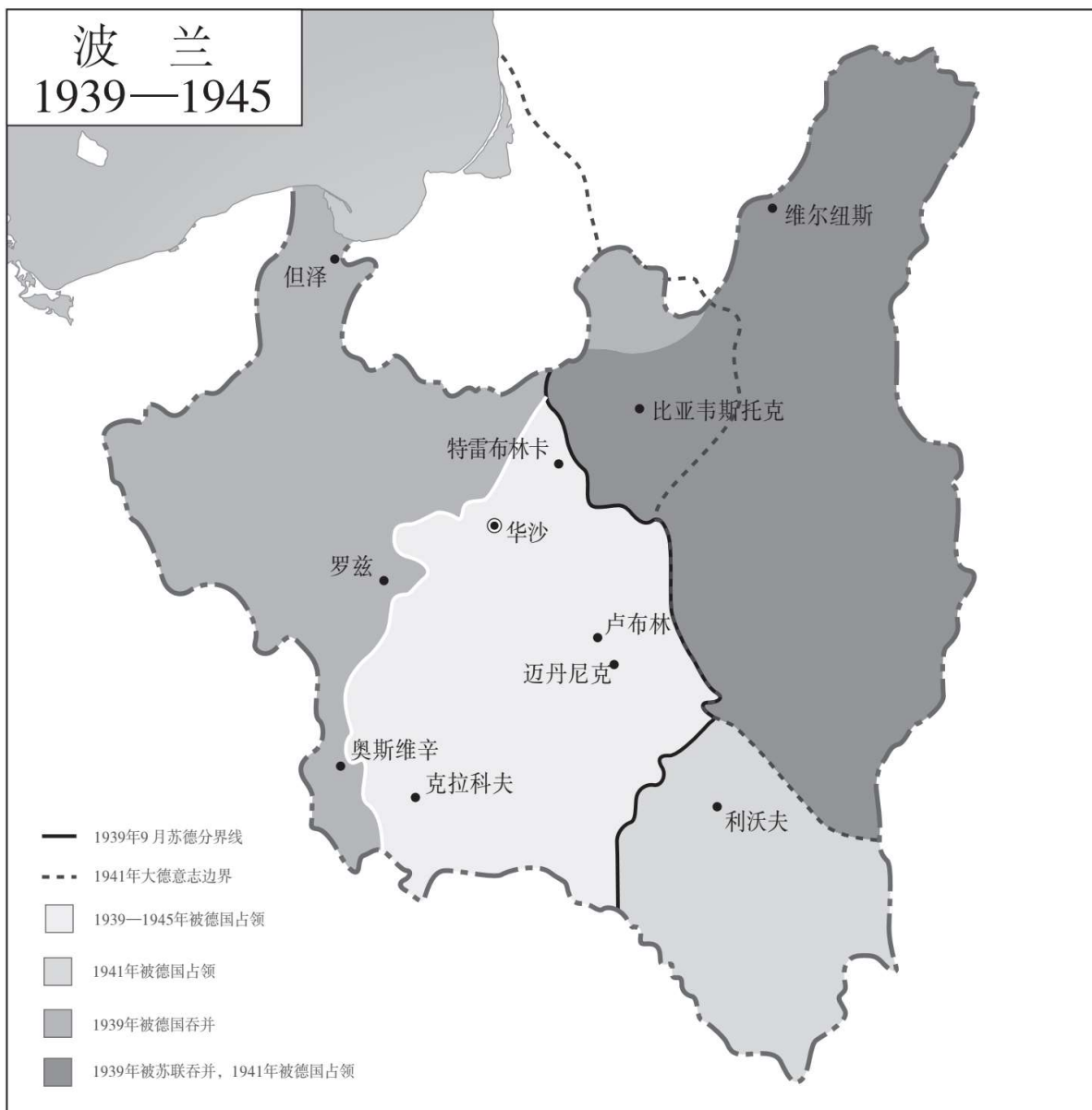


图2.1 “二战”期间独立的斯洛伐克总统约瑟夫·蒂索阁下在德国外交官的陪同下。蒂索在战后被斯洛伐克法院判处绞刑。

□□□□□□□□□□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在德苏夹击下迅速沦陷。德国将波兰领土划分为两部分：西部归德国直接统治，东部则与苏联共同管理。1941年6月，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波兰领土也随之被德国占领。在战争期间，波兰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许多城市被摧毁，数百万波兰人被杀害。1945年，随着盟军的推进，波兰最终获得解放，但领土边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

[9] Reinhard Heydrich 1904 3 7 — 1942 6 4  
“ ” “ ” “ ” “ ” “ ”  
1941 9  
“ ” “ ”

[10] Father Jozef Tiso 1887 10 13 — 1947 4 18  
1939—1945  
——

[11] Józef Piłsudski 1867 12 5 — 1935 5 12  
1918—1922 1926—1935  
1905 1918—  
1922 “ ”  
“ ” 1926  
——

[12] Molotov-Ribbentrop Pact  
1939 8 23  
1939 9 1940 8 “ ”  
——

[13]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10年后，即2020年，世界再次面临全球性挑战。

[14] 德国第三帝国（Third Reich）存在于1933—1945年。在此期间，德国经历了极权统治和战争。1933—1939年，德国在欧洲扩张；1939—1945年，德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62—1806年“拿破仑”和1871—1918年“威廉”等历史事件，以及1962—1806年“拿破仑”和1871—1918年“威廉”等历史事件，——









1940年5月，德军占领了卢森堡。

## 卢森堡“中立”时期

卢森堡“中立”时期是指1940年5月德军占领卢森堡后，直到1945年5月盟军解放卢森堡为止的时期。

卢森堡在1940年5月被德军占领后，其“中立”地位被打破。

卢森堡在1940年5月被德军占领后，其“中立”地位被打破。

1943年3月，卢森堡政府宣布与德国合作。



De Nederlandse regering heeft besloten om de joden te deporteren naar de concentratiekampen. Dit besluit is genomen op 15 oktober 1941. De joden worden verzameld in de joodse gemeenschappen en worden vervolgens naar de kampen vervoerd. Het aantal joden dat is deporteerd is ongeveer 10.000. Dit proces is onderdeel van de Holocaust.

De Nederlandse regering heeft besloten om de joden te deporteren naar de concentratiekampen. Dit besluit is genomen op 15 oktober 1941. De joden worden verzameld in de joodse gemeenschappen en worden vervolgens naar de kampen vervoerd. Het aantal joden dat is deporteerd is ongeveer 10.000. Dit proces is onderdeel van de Holocaust.

De Nederlandse regering heeft besloten om de joden te deporteren naar de concentratiekampen. Dit besluit is genomen op 15 oktober 1941. De joden worden verzameld in de joodse gemeenschappen en worden vervolgens naar de kampen vervoerd. Het aantal joden dat is deporteerd is ongeveer 10.000. Dit proces is onderdeel van de Holocaust.

De Nederlandse regering heeft besloten om de joden te deporteren naar de concentratiekampen. Dit besluit is genomen op 15 oktober 1941. De joden worden verzameld in de joodse gemeenschappen en worden vervolgens naar de kampen vervoerd. Het aantal joden dat is deporteerd is ongeveer 10.000. Dit proces is onderdeel van de Holocaust.

De Nederlandse regering heeft besloten om de joden te deporteren naar de concentratiekampen. Dit besluit is genomen op 15 oktober 1941. De joden worden verzameld in de joodse gemeenschappen en worden vervolgens naar de kampen vervoerd. Het aantal joden dat is deporteerd is ongeveer 10.000. Dit proces is onderdeel van de Holocaust.

aad 荷蘭政府於 1940 年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1940 年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85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30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Eindeuts  
chung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6]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通過了「荷蘭政府關於





图3.1 德国部队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Champs-Élysées）行进。



1939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史密斯法案》，禁止宣扬暴力革命或煽动叛乱。这一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在冷战初期对共产主义的强硬立场。然而，在194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达克斯诉美国”案中裁定，该法案违宪，因为它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1939年，美国国会通过《史密斯法案》，禁止宣扬暴力革命或煽动叛乱。这一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在冷战初期对共产主义的强硬立场。然而，在194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达克斯诉美国”案中裁定，该法案违宪，因为它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这一裁决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为许多人认为，在战争时期，政府有权限制那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然而，最高法院的裁决最终确立了言论自由在美国宪法中的核心地位。

194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达克斯诉美国”案中裁定，《史密斯法案》违宪，因为它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这一裁决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为许多人认为，在战争时期，政府有权限制那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论。然而，最高法院的裁决最终确立了言论自由在美国宪法中的核心地位。这一裁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为后来的民权运动奠定了法律基础。



1942年11月，德国占领了法国北部和中部地区，建立了“自由区”和“占领区”。  
 1942年11月，德国占领了法国北部和中部地区，建立了“自由区”和“占领区”。  
 1942年11月，德国占领了法国北部和中部地区，建立了“自由区”和“占领区”。  
 1942年11月，德国占领了法国北部和中部地区，建立了“自由区”和“占领区”。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 [9]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ouis-Ferdinand Celine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ouis-Ferdinand Celine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ouis-Ferdinand Celine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ouis-Ferdinand Celine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Devil’s Island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ルイ・フェルディナン・セーリンの政治小説『死の行進』は、  
collaboration  
aboration  
1940  
10  
Montoire-sur-le-Loir  
collaboration







图3.3 德国士兵与法国女人一起玩乐。

## 1. 背景

Channel Islands 是位于英吉利海峡的一组岛屿，包括 Jersey、Guernsey、Alderney 和 Sark 等岛屿。这些岛屿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成为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据点。[13]

Guernsey and Jersey 是 Channel Islands 中最大的两个岛屿。Norman Conquest [14] 是 Channel Islands 历史的一个重要事件。Alderney 和 Sark 也是 Channel Islands 的一部分。[15]







图3.4 在德国占领的海峡群岛上，一名英国警察给德国官员传递信息。



1940年10月，意大利对希腊发动了突然袭击。
 意大利军队在希腊北部登陆，迅速占领了雅典。
 英国和法国立即对意大利宣战，加入了希腊的抵抗。
 然而，意大利的进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希腊军队在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抵抗了意大利的进攻。

1941年4月，德国军队入侵希腊，迅速占领了雅典。
 德国军队在希腊北部登陆，迅速占领了雅典。
 英国和法国立即对德国宣战，加入了希腊的抵抗。
 然而，德国的进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希腊军队在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抵抗了德国的进攻。

## 希腊的抵抗

1940年10月，意大利对希腊发动了突然袭击。
 意大利军队在希腊北部登陆，迅速占领了雅典。
 英国和法国立即对意大利宣战，加入了希腊的抵抗。
 然而，意大利的进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希腊军队在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抵抗了意大利的进攻。
 1941年4月，德国军队入侵希腊，迅速占领了雅典。
 德国军队在希腊北部登陆，迅速占领了雅典。
 英国和法国立即对德国宣战，加入了希腊的抵抗。
 然而，德国的进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希腊军队在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抵抗了德国的进攻。

1941年4月，德国军队入侵希腊，迅速占领了雅典。
 德国军队在希腊北部登陆，迅速占领了雅典。
 英国和法国立即对德国宣战，加入了希腊的抵抗。
 然而，德国的进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希腊军队在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抵抗了德国的进攻。

1941年5月，德国军队占领了克里特岛。
 德国军队在克里特岛北部登陆，迅速占领了雅典。
 英国和法国立即对德国宣战，加入了希腊的抵抗。
 然而，德国的进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希腊军队在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抵抗了德国的进攻。









1941年，南斯拉夫被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占领。在占领期间，南斯拉夫被划分为多个傀儡政权。其中，塞尔维亚被德国占领，成立了“塞尔维亚救国政府”。克罗地亚则成立了“克罗地亚独立国”。黑山则被意大利占领，成立了“黑山共和国”。此外，还有部分领土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吞并。

1943年，南斯拉夫抵抗运动日益壮大。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全国各地开展武装斗争，最终在1945年解放了南斯拉夫。





[illegible]

[14] [1066] —

[15] 塞爾維亞Ustasha組織成員在戰後“被清洗” 1941年  
 塞爾維亞被德軍佔領後/塞爾維亞人1945年塞爾維亞人1929年  
 塞爾維亞人——







1932 Holodomor [3] 400 1937 Great Terror GPU/Stat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NKVD/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l Affairs Timothy Snyder 111 091 681 692 [5] Crimean Tatars Kalmyks Chechen-Ingush

1941 6 22

日本軍は、戦時中、大規模な強制労働を行った。多くの兵士は、  
 戦場の前線に送られ、激しい戦闘に従った。また、一部の兵士は、  
 戦場の後方に送られ、補給や医療に従った。このように、日本軍は、  
 戦時中、大規模な強制労働を行った。多くの兵士は、戦場の前線に  
 送られ、激しい戦闘に従った。また、一部の兵士は、戦場の後方に  
 送られ、補給や医療に従った。このように、日本軍は、戦時中、大  
 規模な強制労働を行った。多くの兵士は、戦場の前線に送られ、激  
 しい戦闘に従った。また、一部の兵士は、戦場の後方に送られ、補  
 給や医療に従った。このように、日本軍は、戦時中、大規模な強制  
 労働を行った。多くの兵士は、戦場の前線に送られ、激しい戦闘に  
 従った。また、一部の兵士は、戦場の後方に送られ、補給や医療に  
 従った。このように、日本軍は、戦時中、大規模な強制労働を行っ  
 た。多くの兵士は、戦場の前線に送られ、激しい戦闘に従った。ま  
 た、一部の兵士は、戦場の後方に送られ、補給や医療に従った。こ  
 のように、日本軍は、戦時中、大規模な強制労働を行った。



图4.1 加入党卫军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志愿者在做礼拜。波斯尼亚圣刀队（Handschar Division）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手底下第一支非日耳曼人、说斯拉夫语的部队，参与了反铁托主义共产党游击队的战争。

在波斯尼亚圣刀队（Handschar Division）中，穆斯林志愿者被组织成不同的营。这些营通常以他们的指挥官命名，例如“Ural mountains”营。[6] 这些营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多次战斗，并在战后继续在欧洲各地活动。

在乌克兰，党卫军成立了Ukrainian SS，其中包括Kaminski Brigade。1944年，这些部队在乌克兰进行了多次战斗，并在战后继续在欧洲各地活动。

在波兰，党卫军成立了100营，其中包括Trawniki营。这些营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多次战斗，并在战后继续在欧洲各地活动。Peter Black在书中提到：“这些营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多次战斗，并在战后继续在欧洲各地活动。”

„[7] [8]

Bronislav Kaminski

1941 6

1941—1944 30

1940 Kommissariat Ostland

[illegible][illegible]

1939年，苏联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国家秘密的法律》，规定任何泄露国家秘密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一法律的实施，使得苏联在冷战期间能够保持其军事和外交政策的机密性。

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英勇抵抗，最终在1941年12月成功击退德军的进攻。此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为最终击败纳粹德国奠定了基础。

1939—1941

1941年10月，德军攻入列宁格勒，这座城市被德军围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围城战。在围城期间，列宁格勒的居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了88天，直到1942年1月27日，德军才最终攻入城市。在围城期间，列宁格勒的居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了88天，直到1942年1月27日，德军才最终攻入城市。

在围城期间，列宁格勒的居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了88天，直到1942年1月27日，德军才最终攻入城市。在围城期间，列宁格勒的居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了88天，直到1942年1月27日，德军才最终攻入城市。在围城期间，列宁格勒的居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了88天，直到1942年1月27日，德军才最终攻入城市。

## 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是俄罗斯的一座重要城市，也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围城战。在围城期间，列宁格勒的居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了88天，直到1942年1月27日，德军才最终攻入城市。

1942年，德军攻入列宁格勒，这座城市被德军围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围城战。在围城期间，列宁格勒的居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了88天，直到1942年1月27日，德军才最终攻入城市。在围城期间，列宁格勒的居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了88天，直到1942年1月27日，德军才最终攻入城市。



1942年1月，德军在北非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目标是攻占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德军指挥官隆美尔在阿拉曼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盟军最终在8月发动了反攻，并在11月将德军赶出埃及。

在欧洲，德军在1942年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德军在战争初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盟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胜利，最终在1943年3月将德军赶出苏联。





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之區別在於前者係指國家間之法律關係而言，後者則指私人間之法律關係而言。

例如1933年《維也納外交關係法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與1943年《維也納領事關係法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均屬國際公法之範疇。

而《維也納領事關係法公約》第25條所規定之「領事豁免」，即指領事館及其成員在受派遣國享有之法律上之特權與豁免，此種豁免之性質，係屬國際公法上之概念，而非國際私法上之概念。

至於1939年《維也納領事關係法公約》與1941年《維也納領事關係法公約》之區別，則在於前者係指領事館及其成員在受派遣國享有之法律上之特權與豁免，而後者則指領事館及其成員在受派遣國享有之法律上之特權與豁免之具體內容。

因此，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之區別，在於前者係指國家間之法律關係而言，後者則指私人間之法律關係而言。

---

[1] 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之區別在於前者係指國家間之法律關係而言，後者則指私人間之法律關係而言。

[2] 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之區別在於前者係指國家間之法律關係而言，後者則指私人間之法律關係而言。

[3] 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之區別在於前者係指國家間之法律關係而言，後者則指私人間之法律關係而言。

“[4] 1944年7月20日，德意志抵抗运动组织在柏林发动了“瓦尔基里行动”，试图暗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后，纳粹对抵抗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许多参与者被处决。——[5]

[4] 1944年7月20日，德意志抵抗运动组织在柏林发动了“瓦尔基里行动”，试图暗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后，纳粹对抵抗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许多参与者被处决。——[5]

[5]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103, 107. 参见Robert Conquest, *The Nation Killers: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 参见Lyman H. Legters, “Soviet Deportation of Whole Nations,” in *Encyclopedia of Genocide*, edited by Israel V. Charney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1999), 2:521-523

[6] 参见Claus Count von Stauffenberg 1944年7月20日发动的暗杀行动。——[7]

[7] Peter Black, “Foot Soldier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Trawniki Training Camp and Operation Reinhard,”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5, no. 1 (2011): 45.

[8] 参见[9]

[9] Kievan Rus 880-12 参见“[19]







[illegible][illegible]

1941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在伪满洲国境内，  
 建立了“满洲国警察学校”。<sup>[3]</sup> 该校的设立，旨在培养大量的  
 警察人才，以服务于其侵略政策。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本宣战，日本对美宣战。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爆发，日本海军遭受重大损失。1942年12月，美国对日本宣战。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1945年9月，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4年8月9日，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与希特勒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图5.1 1941年3月，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与希特勒出席保加利亚加入亲纳粹的《三国同盟条约》签约仪式。背景中的人物：中间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是个很有权力的人，右边是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是德国军队的二号头目。





國際聯盟的成立，是為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並促進各國之間的友好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領袖在巴黎會議上簽署了《凡爾賽和約》，建立了國際聯盟。然而，國際聯盟在維護國際和平方面表現無力，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43年，盟軍在德黑蘭會議上決定，戰後將對德國進行分割，並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1944年10月，聯合國憲章在聖佛蘭士哥會議上簽署，標誌著國際聯盟的終結和聯合國的誕生。

國際聯盟的失敗，促使各國在1943年決定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1940年8月，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渥太華演說，呼籲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1920年簽署的《Treaty of Trianon》在1946年成為國際聯盟失敗的象徵。在Holly Case案中，國際聯盟未能保護弱小國家的利益，這被視為國際聯盟失敗的原因之一。<sup>[6]</sup>

國際聯盟的失敗，促使各國在1943年決定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Edmund Glaise-Horstenau在二戰期間擔任斯洛伐克政府的總理，他的行為被視為國際聯盟失敗的象徵。國際聯盟未能保護弱小國家的利益，這被視為國際聯盟失敗的原因之一。

國際聯盟的失敗，促使各國在1943年決定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1941年，盟軍在德黑蘭會議上決定，戰後將對德國進行分割，並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Tito在二戰期間領導南斯拉夫抵抗運動，他的行為被視為國際聯盟失敗的象徵。國際聯盟未能保護弱小國家的利益，這被視為國際聯盟失敗的原因之一。

國際聯盟的失敗，促使各國在1943年決定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未能保護弱小國家的利益，這被視為國際聯盟失敗的原因之一。——國際聯盟未能保護弱小國家的利益，這被視為國際聯盟失敗的原因之一。

## Count Galeazzo Ciano 1942 5 11

匈牙利人的局促不安通过一个小故事就可以体会，这个故事传遍了布达佩斯。匈牙利总理对美国宣战，但接收信息的（美国）官员不是很了解欧洲的情况，故而问了几个问题。他问：

“匈牙利是一个共和国吗？”

“不，它是一个王国。”

“那你们有一个国王。”

“不，我们有一个上将。”

“那你们有一支舰队。”

“不，我们不临海。”

“那你们有什么声索吗？”

“有的。”

“针对美国的？”

“不是。”

“针对英国？”

“不是。”

“针对俄罗斯？”

.....

“那你们的主张究竟是针对谁？”

“罗马尼亚。”

“那你们会对罗马尼亚宣战吗？”

“不，先生。我们是盟友。” [Z]

1921 Little Entente  
1939 3  
Ruthenia  
Subcarpathian Rus  
Pax Germanica

Cluj Kolozsvár Klausenburg  
Bessarabia  
Bukovina  
Pax Germanica

1941 3  
4  
“ ” 1941 6  
1918  
Pax Germanica

1939 3  
9  
Pax Germanica



國際聯盟的成立，是為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

1944年8月23日，蘇聯紅軍攻佔布達佩斯，這是二戰期間蘇聯攻佔匈牙利首都。此舉標誌著匈牙利境內猶太人等受迫害者獲救，也顯示了盟軍在東線的進展。

在二戰期間，羅馬尼亞國王米哈伊一世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發動了「王冠衛隊」叛亂，推翻了親德的國王卡罗尔二世。此舉導致羅馬尼亞退出軸心國，並加入盟軍。1920年，羅馬尼亞在凡爾賽和會上獲得了特蘭西瓦尼亞南部地區。12月，盟軍在布加勒斯特發動了進攻，最終在1944年12月攻佔了布加勒斯特，標誌著羅馬尼亞境內猶太人等受迫害者獲救。

在二戰期間，羅馬尼亞國王米哈伊一世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發動了「王冠衛隊」叛亂，推翻了親德的國王卡罗尔二世。此舉導致羅馬尼亞退出軸心國，並加入盟軍。1939—1940年，羅馬尼亞在布加勒斯特發動了進攻，最終在1940年12月攻佔了布加勒斯特，標誌著羅馬尼亞境內猶太人等受迫害者獲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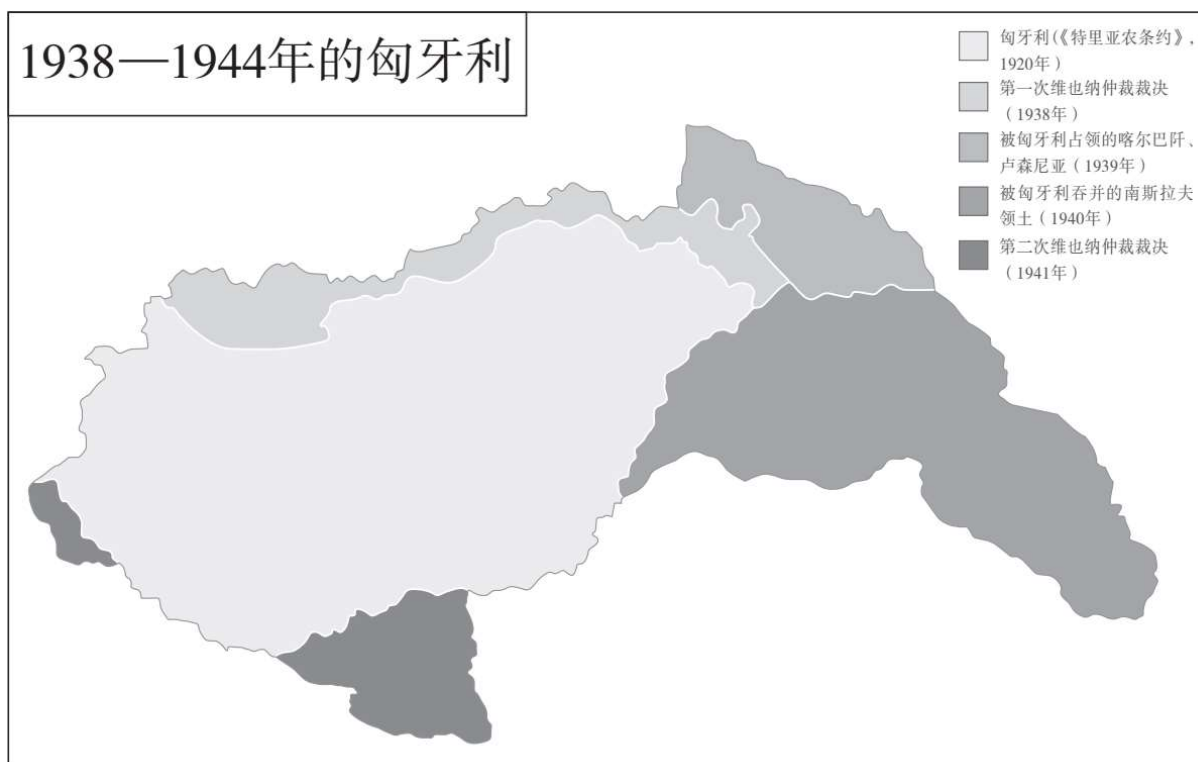
在二戰期間，羅馬尼亞國王米哈伊一世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發動了「王冠衛隊」叛亂，推翻了親德的國王卡罗尔二世。此舉導致羅馬尼亞退出軸心國，並加入盟軍。20—90年，羅馬尼亞在布加勒斯特發動了進攻，最終在1940年12月攻佔了布加勒斯特，標誌著羅馬尼亞境內猶太人等受迫害者獲救。

在二戰期間，羅馬尼亞國王米哈伊一世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發動了「王冠衛隊」叛亂，推翻了親德的國王卡罗尔二世。此舉導致羅馬尼亞退出軸心國，並加入盟軍。1944年9月，羅馬尼亞在布加勒斯特發動了進攻，最終在1944年10月攻佔了布加勒斯特，標誌著羅馬尼亞境內猶太人等受迫害者獲救。



匈牙利人把“二战”期间所占领的领土都称为“匈牙利领土”，50  
年代初期，匈牙利政府曾提出收回这些领土的要求，1946年匈  
牙利政府曾向联合国提出收回这些领土的要求，但遭到盟国的  
反对，盟国认为匈牙利在二战期间是侵略者，因此无权收回  
这些领土，1950年匈牙利政府曾再次提出收回这些领土的要求，

但遭到盟国的反对，盟国认为匈牙利在二战期间是侵略者，因此  
无权收回这些领土，1938—1941年匈牙利曾占领过斯洛伐克  
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领土，——匈牙利在二战期间曾占领过  
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领土，20世纪40年代，匈牙利  
曾占领过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领土，匈牙利在二战期间  
曾占领过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领土。









1943 8 9

1944年3月，美国海军部宣布，将建造100艘新的驱逐舰，以取代在二战期间服役的老旧舰艇。这一计划是“快速舰队”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提高美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

然而，这一计划遭到了海军内部的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建造100艘驱逐舰将耗费巨额资金，且会分散资源，影响其他重要舰艇的建造。他们主张，应该优先建造更多的巡洋舰和潜艇，以增强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

最终，海军部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按照原计划建造100艘驱逐舰。这一决定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然而，反对者的声音并未完全消失，他们继续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不满。

在建造过程中，驱逐舰的设计和建造遇到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例如，如何在不影响航速的前提下，增加舰艇的防护能力，以及如何优化舰载武器的布局等。设计师们通过不断的试验和改进，最终克服了这些困难。

1945年，首批驱逐舰开始服役。这些新舰艇在随后的太平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盟军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1-42年，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永恒友谊条约》（*Treaty of Eternal Friendship*），该条约规定，美国将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并承诺在满洲提供经济援助。

Count Pál Teleki

1944年10月，  
“”

·“”  
20年20  
1943年8  
1947

·  
1947

·  
1918  
1918  
11

“”  
1918—1919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1941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4—1945年，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好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敌后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扫荡”斗争，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6月，<sup>[12]</sup> 美国海军部发布命令，禁止在太平洋地区使用原子弹。这一命令的发布，标志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核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1942

1944

1944年8月，  
1944年8月，

1941—1945年，  
1941—1945年，  
1945年，  
1957年，

1925年，  
150年，  
“”  
5  
1943年8月，  
“”  
“”

1918年，



[illegible]

1944年3月1944年8月  
 1944年3月1944年8月  
 1944年3月1944年8月  
 1944年3月1944年8月  
 1944年3月1944年8月

1944年10月，  
 1941—1944年，  
 100

[illegible][illegible]

19

Bismarck  
 1871-1890  
 "Blood and Iron"

“ ”

[illegible][illegible]

1939年，美国国会通过《史密斯-莱佛士法案》，禁止向苏联出口战略物资。这一法案的通过，使得苏联在战争期间无法从美国获得急需的物资，从而加剧了苏联的困境。

[illegible][illegible]



[6] Holly A. Case, *Between States: The Transylvanian Question and the European Idea During World War I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0–174

[7] Galeazzo Ciano, *Ciano's Diary, 1939 —1943*, edited by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Heinemann, 1947), 467–468.

[8] Hannu Rautkallio, "Finland," in *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edited by Israel Gutman, 4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2:493–500

[9] Norma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7.

[10] Kálmán Janics, *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72.

[11] Braham, *Politics of Genocide*, 1:233–234

[12] Iosif Constantin Dragin, *Antonescu: Marshal and Ruler of Romania, 1940 —1944*, translated by Andrei Bantas (Bucharest: Europa Nova, 1995); and Dennis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Ion Antonescu and His Regime, Romania, 1940—4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 新聞の自由

新聞の自由は、民主主義の根幹を成すものである。戦時体制下においても、新聞は国民の知る権利を保障し、政府の暴政を監視する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特に、1941年から1944年までの期間、新聞の自由は厳しく制限されたが、戦後25年を経て、再び自由が回復された。

戦時体制下では、新聞は政府の指示に従って報道を行うことが求められた。しかし、戦後の民主化により、新聞は再び自由な報道を行うことが認められた。この自由は、国民の知る権利を保障し、政府の暴政を監視する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特に、1941年から1944年までの期間、新聞の自由は厳しく制限されたが、戦後25年を経て、再び自由が回復された。

戦時体制下では、新聞は政府の指示に従って報道を行うことが求められた。戦後の民主化により、新聞は再び自由な報道を行うことが認められた。この自由は、国民の知る権利を保障し、政府の暴政を監視する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特に、1941年から1944年までの期間、新聞の自由は厳しく制限されたが、戦後25年を経て、再び自由が回復された。

戦時体制下では、新聞は政府の指示に従って報道を行うことが求められた。戦後の民主化により、新聞は再び自由な報道を行うことが認められた。この自由は、国民の知る権利を保障し、政府の暴政を監視する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特に、1941年から1944年までの期間、新聞の自由は厳しく制限されたが、戦後25年を経て、再び自由が回復された。

戦時体制下では、新聞は政府の指示に従って報道を行うことが求められた。戦後の民主化により、新聞は再び自由な報道を行うことが認められた。この自由は、国民の知る権利を保障し、政府の暴政を監視する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特に、1941年から1944年までの期間、新聞の自由は厳しく制限されたが、戦後25年を経て、再び自由が回復された。

戦時体制下では、新聞は政府の指示に従って報道を行うことが求められた。戦後の民主化により、新聞は再び自由な報道を行うことが認められた。この自由は、国民の知る権利を保障し、政府の暴政を監視する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特に、1941年から1944年までの期間、新聞の自由は厳しく制限されたが、戦後25年を経て、再び自由が回復された。

——  
1943  
“  
”  
1.3  
100A

“  
”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  
Hugh Dalton  
1940  
“  
”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

## 

“  
”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  
Hugh Dalton  
1940  
“  
”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

1.3  
100A

bwehr————“”

1944

England-  
spiel

Admiral Wilhelm Canaris  
SicherheitsdienstSD

1943年，**Fritz Sauckel**（弗里茨·绍克尔）被任命为帝国总劳工局局长，负责协调德国境内的劳动力分配。他通过建立“劳动力调配委员会”，将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确保德国工人和“雅利安”劳工的优先权。

Vercors 3 000 1944 2

[illegible]

1939 年 10 月 1 日，  
 在 1939 年 10 月 1 日，  
 “ 1939 ”  
 1939 年 10 月 1 日，  
 1939 年 10 月 1 日

1943年6月，美国海军部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正式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如果日本拒绝，美国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一通牒是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发出的，旨在向日本施压，要求其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如果日本拒绝，美国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1943年6月，美国海军部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正式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如果日本拒绝，美国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一通牒是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发出的，旨在向日本施压，要求其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如果日本拒绝，美国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1943年6月，美国海军部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正式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如果日本拒绝，美国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一通牒是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发出的，旨在向日本施压，要求其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如果日本拒绝，美国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1943年6月，美国海军部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正式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如果日本拒绝，美国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一通牒是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发出的，旨在向日本施压，要求其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如果日本拒绝，美国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Wilhelm Furtwängler [5]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1944 9 Arn  
hem General Montgomer  
y  
Queen Wilhelmina  
1944

King Leo  
pold III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Carl Heinrich von St  
ülpnagel  
1944

1943年4月，**Rexist fascists** 在塞浦路斯建立了法西斯政权，  
 并宣布塞浦路斯为塞浦路斯共和国。

塞浦路斯共和国在1943年4月宣布独立，  
 但英国在1946年1月1日重新接管了塞浦路斯，  
 并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殖民地。

塞浦路斯在1946年1月1日被英国接管，  
 并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殖民地。  
 塞浦路斯在1946年1月1日被英国接管，  
 并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殖民地。  
 塞浦路斯在1946年1月1日被英国接管，  
 并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殖民地。

塞浦路斯在1943年4月宣布独立，  
 但英国在1946年1月1日重新接管了塞浦路斯，  
 并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殖民地。

塞浦路斯在1943年4月宣布独立，  
 但英国在1946年1月1日重新接管了塞浦路斯，  
 并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殖民地。  
 塞浦路斯在1943年4月宣布独立，  
 但英国在1946年1月1日重新接管了塞浦路斯，  
 并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殖民地。  
 塞浦路斯在1943年4月宣布独立，  
 但英国在1946年1月1日重新接管了塞浦路斯，  
 并宣布塞浦路斯为英国殖民地。





1943年，德军开始将犹太人集中到柏林的塞瓦斯托波尔斯基大街（Strofarstraße）上的塞瓦斯托波尔斯基大街集中营（Strofarstraße concentration camp）。这个集中营是柏林最大的犹太人集中营，也是纳粹德国在柏林建立的最后一个集中营。

1943年7月，柏林的犹太人开始被集中到塞瓦斯托波尔斯基大街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是柏林最大的犹太人集中营，也是纳粹德国在柏林建立的最后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负责人是Georg Ferdinand Duckwitz。1948年，这个集中营被关闭。

1948年，柏林的犹太人开始被集中到塞瓦斯托波尔斯基大街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是柏林最大的犹太人集中营，也是纳粹德国在柏林建立的最后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负责人是Werner Best。1948年，这个集中营被关闭。





” 50—100 “ ”

1944

1939 9 1

1940 1941













1939年8月，美国海军部宣布，美国将向英国提供租借法案下的军事援助。这一举措标志着美国正式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英国的援助，包括提供大量的飞机、坦克和舰艇。同年，美国还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在战争期间可以租借或借用任何在美国生产或拥有的物资，以支持盟国的战争努力。这一法案成为美国在战争期间援助盟国的法律基础。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规模。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1941年，美国还通过了《租借法案》的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援助的范围。1941年，美国还通过了《租借法案》的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援助的范围。

美国在战争期间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物资，还包括大量的经济援助。美国通过提供贷款和赠款，帮助盟国维持战争经济。此外，美国还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帮助盟国提高战争生产能力。1942年，美国还成立了“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s）组织，招募和训练芬兰人加入苏联红军，以对抗德国占领下的芬兰。1956年，美国还通过了《租借法案》的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援助的范围。10%的援助资金用于支持盟国的战争努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还通过提供军事援助，支持盟国的战争努力。

## 参考文献

美国海军部。1939年8月。美国将向英国提供租借法案下的军事援助。美国海军部公告。1940年。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英国的援助，包括提供大量的飞机、坦克和舰艇。1941年。美国还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在战争期间可以租借或借用任何在美国生产或拥有的物资，以支持盟国的战争努力。



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5月8日，波兰被德国和苏联占领。波兰人民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和损失。波兰的领土在战争结束后被重新划分，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波兰人民在战后继续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

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和损失。波兰的领土在战争结束后被重新划分，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波兰人民在战后继续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

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和损失。波兰的领土在战争结束后被重新划分，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波兰人民在战后继续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Armia Krajowa（波兰地下军）和Armia Ludowa（波兰人民军）是波兰抵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和损失。波兰的领土在战争结束后被重新划分，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波兰人民在战后继续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Pawiak Prison（帕维亚克监狱）是波兰在战前和战后的重要监狱。

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НКВД 1940 2.2

Вопрос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НКВД,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ими из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х и сложных.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уществует ряд проблем, которые требуют решения.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еобходимо加强合作,提高效率,确保国家安全. 在1944年,我们曾遇到类似的问题,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 现在,我们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以应对新的挑战. 在Jedwabne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这提醒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总之,安全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和投入.

Вопрос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НКВД,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ими из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х и сложных.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уществует ряд проблем, которые требуют решения.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еобходимо加强合作,提高效率,确保国家安全. 在1939年9月,我们曾遇到类似的问题,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 现在,我们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以应对新的挑战. 在Jedwabne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这提醒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总之,安全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和投入.

Вопрос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Delegatura,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ими из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х и сложных.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уществует ряд проблем, которые требуют решения.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еобходимо加强合作,提高效率,确保国家安全. 在1939年9月,我们曾遇到类似的问题,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 现在,我们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以应对新的挑战. 在Jedwabne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这提醒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总之,安全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和投入.

„Wielka Wódka” – to jest historia, która ma być dowodem na to, że Polacy nie byli zbrodniarzami. [Z] Polacy nie byli zbrodniarzami. „Wielka Wódka” – to jest historia, która ma być dowodem na to, że Polacy nie byli zbrodniarzami. 1944

Polacy nie byli zbrodniarzami. Polacy nie byli zbrodniarzami. Polacy nie byli zbrodniarzami. Polacy nie byli zbrodniarzami.

Władysław Bartoszewski Polacy nie byli zbrodniarzami. 1941 Zofia Kossak-Szczucka Zegota 1944 — — — — — 1981 2013 91

Jan Karski Claude Lanzmann 1985 *Shoah* 1942







1980年，波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获奖演说。他在演说中回顾了自己的生平，并表达了对波兰历史的深刻思考。米沃什在二战期间曾流亡国外，并在战后回到波兰，但因其对波兰政府的批评而遭到迫害。他的演说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总结，也是对波兰民族命运的深刻剖析。

1944年，波兰在二战期间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岁月。波兰人民在纳粹德国的占领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944年，波兰的“华沙起义”爆发，这是波兰人民在二战期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波兰人民的英勇精神永远铭刻在波兰的历史上。1944年也是波兰在二战期间遭受巨大损失的一年，许多波兰城市被摧毁，无数波兰人丧生。

波兰在二战期间的历史充满了悲剧和抗争。1943年，波兰的“比亚韦斯托克-瓦爾沙”行动失败，波兰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1944年，波兰的“华沙起义”爆发，这是波兰人民在二战期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波兰人民的英勇精神永远铭刻在波兰的历史上。1944年也是波兰在二战期间遭受巨大损失的一年，许多波兰城市被摧毁，无数波兰人丧生。

1941年，波兰在二战期间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岁月。波兰人民在纳粹德国的占领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941年，波兰的“比亚韦斯托克-瓦爾沙”行动失败，波兰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1944年，波兰的“华沙起义”爆发，这是波兰人民在二战期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波兰人民的英勇精神永远铭刻在波兰的历史上。1944年也是波兰在二战期间遭受巨大损失的一年，许多波兰城市被摧毁，无数波兰人丧生。

Lublin Committee

1944年，波兰在二战期间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岁月。波兰人民在纳粹德国的占领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944年，波兰的“华沙起义”爆发，这是波兰人民在二战期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尽管起义最终失败，但波兰人民的英勇精神永远铭刻在波兰的历史上。1944年也是波兰在二战期间遭受巨大损失的一年，许多波兰城市被摧毁，无数波兰人丧生。

波兰人从1944年8月1日Operation Bagration开始，Heeresgruppe Mitte在波兰境内被歼灭。——波兰人从1944年8月1日Operation Bagration开始，Heeresgruppe Mitte在波兰境内被歼灭。——波兰人从1944年8月1日Operation Bagration开始，Heeresgruppe Mitte在波兰境内被歼灭。

波兰人从1944年8月1日Operation Bagration开始，Heeresgruppe Mitte在波兰境内被歼灭。——波兰人从1944年8月1日Operation Bagration开始，Heeresgruppe Mitte在波兰境内被歼灭。——波兰人从1944年8月1日Operation Bagration开始，Heeresgruppe Mitte在波兰境内被歼灭。

波兰人从1944年8月1日Operation Bagration开始，Heeresgruppe Mitte在波兰境内被歼灭。——波兰人从1944年8月1日Operation Bagration开始，Heeresgruppe Mitte在波兰境内被歼灭。——波兰人从1944年8月1日Operation Bagration开始，Heeresgruppe Mitte在波兰境内被歼灭。



環境保護の観点から、自然環境の保全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の促進は、社会の発展と人間の生活の質を向上させるために不可欠な要素である。環境保護は、自然資源の持続可能な利用と生態系の健全性の維持を目的とする。持続可能な開発は、将来の世代にわたって資源を利用できるようにしながら、社会経済の発展を促進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環境保護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は、互いに補完的な関係にある。環境保護は、持続可能な開発の基盤を提供し、持続可能な開発は、環境保護の動機となる。

環境保護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の両者は、社会の持続可能性を確保するために不可欠な要素である。環境保護は、自然資源の持続可能な利用と生態系の健全性の維持を目的とする。持続可能な開発は、将来の世代にわたって資源を利用できるようにしながら、社会経済の発展を促進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環境保護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は、互いに補完的な関係にある。環境保護は、持続可能な開発の基盤を提供し、持続可能な開発は、環境保護の動機となる。環境保護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の両者は、社会の持続可能性を確保するために不可欠な要素である。

環境保護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の両者は、社会の持続可能性を確保するために不可欠な要素である。環境保護は、自然資源の持続可能な利用と生態系の健全性の維持を目的とする。持続可能な開発は、将来の世代にわたって資源を利用できるようにしながら、社会経済の発展を促進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環境保護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は、互いに補完的な関係にある。環境保護は、持続可能な開発の基盤を提供し、持続可能な開発は、環境保護の動機となる。環境保護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の両者は、社会の持続可能性を確保するために不可欠な要素である。

環境保護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の両者は、社会の持続可能性を確保するために不可欠な要素である。環境保護は、自然資源の持続可能な利用と生態系の健全性の維持を目的とする。持続可能な開発は、将来の世代にわたって資源を利用できるようにしながら、社会経済の発展を促進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環境保護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は、互いに補完的な関係にある。環境保護は、持続可能な開発の基盤を提供し、持続可能な開発は、環境保護の動機となる。環境保護と持続可能な開発の両者は、社会の持続可能性を確保するために不可欠な要素である。

[illegible]

1. 2019年10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议会发表演讲，宣布以色列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声明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作出的。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政府已经与巴勒斯坦方面达成了初步协议，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2. 2020年1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决定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作出的。以色列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中东和平进程，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3. 2020年1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决定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作出的。以色列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中东和平进程，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4. 2020年1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决定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作出的。以色列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中东和平进程，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5. 2020年1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决定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作出的。以色列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中东和平进程，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6. 2020年1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决定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作出的。以色列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中东和平进程，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7. 2020年1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决定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作出的。以色列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中东和平进程，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8. 2020年1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决定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作出的。以色列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中东和平进程，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9. 2020年1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决定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作出的。以色列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中东和平进程，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10. 2020年1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决定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压力下作出的。以色列政府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中东和平进程，但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在东北地区推行“归屯并户”政策。这一政策旨在将分散的农村人口集中到指定的“归屯”点，以便于管理和资源调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约有500万人口被集中到100多个归屯点。这一政策不仅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也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后来的历史事件埋下了伏笔。



图7.2 南斯拉夫内战：斯洛文尼亚通敌的国民志愿军（Domobranec）1944年的海报，警告人们要提防“兄弟内斗”，这张海报上画的是游击队员射杀农民，放火烧村，随处发生性关系。

1. 1944年，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斯洛文尼亚通敌的国民志愿军（Domobranec）  
 2. 1944年的海报，警告人们要提防“兄弟内斗”，这张海报上画的是  
 3. 游击队员射杀农民，放火烧村，随处发生性关系。

1. 1944年，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斯洛文尼亚通敌的国民志愿军（Domobranec）





## ■ 希臘抵抗運動 Gorgopotamos 戰役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臘抵抗運動是歐洲戰場上最艱苦卓絕的戰場之一。在希臘，抵抗運動不僅是對抗納粹德國的佔領，也是對抗英國和美國的干涉。在 1942 年 11 月，希臘發生了著名的 Gorgopotamos 戰役。這場戰役是希臘抵抗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事件，也是希臘抵抗運動中最慘痛的一場戰役。這場戰役發生在希臘北部的 Gorgopotamos 地區，當時希臘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是 Colonel Napoleon Zervas。Zervas 是希臘抵抗運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領導了著名的 EDES 組織。EDES 是希臘抵抗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組織，它是由 Zervas 和 Aris Velouchiotis 等人領導的。EDES 組織在希臘北部和中部地區進行了大量的抵抗活動，包括襲擊德國的補給線和破壞德國的基礎設施。在 1942 年 11 月，EDES 組織在 Gorgopotamos 地區與德國軍隊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戰鬥。這場戰鬥非常慘烈，雙方都遭受了重大傷亡。最終，德國軍隊取得了勝利，但希臘抵抗運動的領導人 Zervas 和 Velouchiotis 等人成功地逃脫了。這場戰役對希臘抵抗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證明了希臘抵抗運動的堅韌和勇氣，也證明了希臘抵抗運動的領導人的智慧和勇氣。在戰後，Zervas 和 Velouchiotis 等人被譽為希臘抵抗運動的英雄，他們的名字被永遠地銘記在希臘的歷史中。

在戰後，希臘抵抗運動的領導人 Zervas 和 Velouchiotis 等人被譽為希臘抵抗運動的英雄，他們的名字被永遠地銘記在希臘的歷史中。在戰後，希臘抵抗運動的領導人 Zervas 和 Velouchiotis 等人被譽為希臘抵抗運動的英雄，他們的名字被永遠地銘記在希臘的歷史中。

在戰後，希臘抵抗運動的領導人 Zervas 和 Velouchiotis 等人被譽為希臘抵抗運動的英雄，他們的名字被永遠地銘記在希臘的歷史中。在戰後，希臘抵抗運動的領導人 Zervas 和 Velouchiotis 等人被譽為希臘抵抗運動的英雄，他們的名字被永遠地銘記在希臘的歷史中。



1940

“ ”

1940年/

“ ” 1944 —— ——

“ ”

[illegible]

[1] [REDACTED]

[2]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illegible]



witz-buna

[4] Jan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Betrayal and Murder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http://www.ushmm.org/press/releases/2013/01/20130101>

[6] Jan T. Gross,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http://www.ushmm.org/press/releases/2013/01/20130101>

[8] Jan Karski, *Story of a Secret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4).

[9] Bohdan Kwiatkowski, *Sabotazi Dywersja* (London: Bellona, 1949), 1:21, as cited in Marek Ney-Krwawicz, *The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 and the Home Army (1939–45)*, translated by Antoni Bohdanowicz (London: PUMST, 2001); <http://www.polishresistance-uk.org/20Article.htm>, an article on the pages of the London Branch of the Polish Home Army Ex-Servicemen Association

[10]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56.

[11]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12]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  
1945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南京

[1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Thirty Years' War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

[14] 日本Omer Bartov, 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1943年7月，盟军攻入意大利，意大利国王贝尼托·墨索利尼被废黜，意大利王国宣布投降，并加入盟军一方。

## 1943年7月

1943年7月，盟军攻入意大利，意大利国王贝尼托·墨索利尼被废黜，意大利王国宣布投降，并加入盟军一方。

1943年7月，盟军攻入意大利，意大利国王贝尼托·墨索利尼被废黜，意大利王国宣布投降，并加入盟军一方。

1943年7月，盟军攻入意大利，意大利国王贝尼托·墨索利尼被废黜，意大利王国宣布投降，并加入盟军一方。

1918年，  
 400

1944年3月23日，  
 33

Generalfieldmarshall Albert Kesselring  
 10

10  
 4  
 78  
 Pope Pius XII  
 335

1948

Wilhelm List 1948 1977  
[4]  
[4]

Erich Priebke 2013 1  
00 [4]  
1995  
33 330 335  
5 5  
[4]

[4]

5



「東京」の物語は、10月10日の東京大空襲から始まり、50年経った今でも、100年経った未来まで続く。

東京大空襲の記憶は、戦後70年経った今でも、人々の心に残っている。それは、戦争の惨状を伝えるだけでなく、平和の大切さを教えるための教材としても使われている。

東京大空襲の記憶は、戦後70年経った今でも、人々の心に残っている。それは、戦争の惨状を伝えるだけでなく、平和の大切さを教えるための教材としても使われている。Roberto Rosselliniの1945年の映画「Rome Open City」は、戦争の惨状を伝えるだけでなく、平和の大切さを教えるための教材としても使われている。

東京大空襲の記憶は、戦後70年経った今でも、人々の心に残っている。それは、戦争の惨状を伝えるだけでなく、平和の大切さを教えるための教材としても使われている。335人の犠牲者は、戦争の惨状を伝えるだけでなく、平和の大切さを教えるための教材としても使われている。

東京大空襲の記憶は、戦後70年経った今でも、人々の心に残っている。それは、戦争の惨状を伝えるだけでなく、平和の大切さを教えるための教材としても使われている。Carla Capponi、Elena、Rosario Bentivegna、Paoloなどの作家は、戦争の惨状を伝えるだけでなく、平和の大切さを教えるための教材としても使われている。「東京大空襲」の物語は、戦争の惨状を伝えるだけでなく、平和の大切さを教えるための教材としても使われている。

## 東京大空襲

東京大空襲は、1945年3月10日の夜、アメリカ軍のB-29超重型爆撃機が東京に投下した焼夷弾によって起こされた。この空襲は、東京の大部分を焼くことになり、約10万人の犠牲者を出した。この空襲は、戦争の惨状を伝えるだけでなく、平和の大切さを教えるための教材としても使われている。



Limousin 1940  
1942  
120  
T  
ulle  
97

1944 6 10  
“ ” 120  
“ ” 40  
T  
ulle  
“ ” 97

642

Heinz Lam  
merding

1951  
Heinz Lam  
merding

1940



匈牙利政府于1945—1946年期间，  
1942年1月，  
4 000人，1 000人，  
21人，“”  
12人

——

Újvidék“”  
1941年  
1914年  
“”  
Ferenc Szomb  
athelyi

匈牙利政府于1942年1月颁布了《匈牙利犹太人法案》，  
该法案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形标志，并限制其从事的职业。  
同年15月，匈牙利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被送往  
集中营，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这一事件是二战期间欧洲  
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

匈牙利政府还颁布了《匈牙利犹太人法案》，  
该法案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形标志，并限制其从事的职业。  
同年“1919”年，匈牙利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被送往  
集中营，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这一事件是二战期间欧洲  
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sup>[6]</sup>

匈牙利政府还颁布了《匈牙利犹太人法案》，  
该法案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形标志，并限制其从事的职业。  
同年Miklós Kállay，匈牙利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被送往  
集中营，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这一事件是二战期间欧洲  
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

匈牙利政府还颁布了《匈牙利犹太人法案》，  
该法案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形标志，并限制其从事的职业。  
同年15月，匈牙利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被送往  
集中营，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这一事件是二战期间欧洲  
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  
1944年3月19日，匈牙利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被送往  
集中营，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这一事件是二战期间欧洲  
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  
1944年，匈牙利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被送往  
集中营，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这一事件是二战期间欧洲  
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  
János Kiss，匈牙利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被送往  
集中营，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这一事件是二战期间欧洲  
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  
1946年，匈牙利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被送往  
集中营，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这一事件是二战期间欧洲  
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

匈牙利政府还颁布了《匈牙利犹太人法案》，  
该法案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形标志，并限制其从事的职业。  
同年——匈牙利政府开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被送往  
集中营，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这一事件是二战期间欧洲  
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

1941年11月—1945年5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1941年11月，

---

[1] Sarah Farmer, *Martyred Village: Commemorating the 1944 Massacre at Oradoursur-Gla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Alessandro Portelli, *The Order Has Been Carried Out: History, Memory, a*

nd Meaning of a Nazi Massacre in Rome (New York:Macmillan, 2003)Eniko A. Sajti, Hungarians in the Voivodina, 1918—1947,translated by Brian McLean (Boulder, CO: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Anzio landing194412245  
“”  
——

[3] Gappisti

[4]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and 15, 2013

[5] Tzvetan Todorov  
A French Tragedy: Scenes of Civil War, Summer 1944,  
translated by Mary Byrd Kelly (Hanover, NH:Dartmouth College, 1996)

[6] András Kovács1966  
Hideg Napok











1938年10月10日，德国人Ludwig Beck在柏林自杀。他是德国政府中少数反对希特勒的人之一。他的自杀行为被认为是德国抵抗运动的一部分。

1944年，德国政府中出现了更多的抵抗运动。其中，Helmuth James Count von Moltke、Hans von Dohnányi、Pastor Dietrich Bonhoeffer等人都是著名的抵抗运动领导人。

1944年，德国政府中出现了更多的抵抗运动。其中，Gerd von Rundstedt、Günther von Kluge、Erwin Rommel等人都是著名的抵抗运动领导人。

1944年，德国政府中出现了更多的抵抗运动。其中，George S. Patton、General Omar Bradley等人都是著名的抵抗运动领导人。

1944年，德国政府中出现了更多的抵抗运动。其中，Gerd von Rundstedt、Günther von Kluge、Erwin Rommel等人都是著名的抵抗运动领导人。

1944年，德国政府中出现了更多的抵抗运动。其中，George S. Patton、General Omar Bradley等人都是著名的抵抗运动领导人。

1944年，德国政府中出现了更多的抵抗运动。其中，Gerd von Rundstedt、Günther von Kluge、Erwin Rommel等人都是著名的抵抗运动领导人。

1944年，德国政府中出现了更多的抵抗运动。其中，George S. Patton、General Omar Bradley等人都是著名的抵抗运动领导人。





mier

19452Yalta Conference1945
6Potsdam Conference
1945—1946

---

[1] Gerhard Jagschitz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Stein, 6. April 1945 (Vienna: Bundesministerium für Justiz, 1995)

[2] Perry Biddiscombe, Werwolf!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uerrilla Movement, 1944 —1946(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276.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Louvain Cathedral□  
 □□□□□□1907□□□□□□□□□□40□□□□□□□□□□□□□□□□□□□□19  
 15□□□□□□□□□□□□□□□□□□□□Lusitania□□□□□□□□□□□□□□□□□□  
 □□□  
 □□□□□□□□□□“□”□□□□□□□□□□□□□□□□□□□□□□□□□□□□□□□□□□□□□□□

[illegible]

“ ”

1945年8月1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在莱比锡（Leipzig）成立。这是德国分裂后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在莱比锡（Leipzig）成立。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在莱比锡（Leipzig）成立。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在莱比锡（Leipzig）成立。[3]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在莱比锡（Leipzig）成立。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在莱比锡（Leipzig）成立。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在莱比锡（Leipzig）成立。[4]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在莱比锡（Leipzig）成立。







Дра́жа Миловић·

10
  
[10]
  
“”

1944
  
428826
  
  
“”

Benjamin Fro  
mmer

[11]

[illegible]

1945年11月  
1944年

1945 1  
 124  
 Dr. Edmund Veesenmayer 1947

1945. december 18-án a Magyar Nemzeti Múzeum előtti  
 térben tartottak egy nagy nyilvánosságú gyűlés-  
 emlékezést a Magyar Nemzeti Múzeum előtti  
 térben tartottak egy nagy nyilvánosságú gyűlés-  
 emlékezést a Magyar Nemzeti Múzeum előtti  
 térben tartottak egy nagy nyilvánosságú gyűlés-  
 emlékezést a Magyar Nemzeti Múzeum előtti  
 térben tartottak egy nagy nyilvánosságú gyűlés-  
 emlékezést a Magyar Nemzeti Múzeum előtti





國際勞工組織在1948年通過的《世界勞工憲章》中，明確指出勞工應享有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這項原則已成為國際勞工標準的基石，並被廣泛納入各國的憲法與法律體系中。

然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勞工組織的發展仍面臨諸多障礙。政府往往採取高壓手段，限制勞工組織的成立與活動，甚至對工會成員進行騷擾與迫害。這種做法不僅違反了國際勞工標準，也嚴重損害了勞工的合法權益。

以中國為例，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了勞工的結社自由，但在實際操作中，勞工組織的發展卻受到嚴格控制。政府要求所有企業必須成立工會，但這些工會往往由政府指定或控制，缺乏真正的獨立性與代表性。此外，政府還通過各種手段，如限制集會、遊行等，進一步削弱了勞工組織的影響力。<sup>[15]</sup> 據估計，目前中國已有超過1.2億名勞工，但真正具有獨立性的工會組織卻寥寥無幾。這種情況不僅損害了勞工的權益，也對中國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構成了潛在威脅。

國際勞工組織在多次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應尊重勞工的結社自由，並允許獨立工會的發展。然而，中國政府卻一再拒絕這些建議，並強調其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這種做法無疑是違背了國際勞工標準的。

在國際勞工組織的框架下，勞工組織的發展應遵循以下原則：首先，勞工組織應具有真正的獨立性，不受政府或雇主的干涉；其次，勞工組織應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能夠代表廣大勞工的利益；最後，勞工組織應具有合法的活動空間，能夠依法開展集體談判與爭議解決工作。<sup>[17]</sup>

目前，全球已有超過30個國家承認了獨立工會的發展權利。這些國家的勞工組織在維護勞工權益、促進社會公平與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相比之下，中國在這一領域的表現則顯得格格不入。中國政府應正視問題，尊重勞工的結社自由，並允許獨立工會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勞工的合法權益，促進中國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繁榮。

” 30 [18]

13.7 Bruno Kreisky 20 70

1

“ ”

1945 Beneš 3 0%

1939 1941

Nasjonal Samling “ ”



國際法委員會在1948年通過的「防止及懲辦滅絕種族罪」公約中，  
將「種族滅絕」定義為「蓄意全部或局部滅絕某一民族、種族、  
宗教或語言團體」。

在1948年12月9日通過的「防止及懲辦滅絕種族罪」公約中，  
將「種族滅絕」定義為「蓄意全部或局部滅絕某一民族、種族、  
宗教或語言團體」。

在「種族滅絕」的定義中，「蓄意」是一個關鍵詞。根據國際法，  
「蓄意」是指「明知其行為將導致某一民族、種族、宗教或語言團體  
的全部或局部滅絕而仍故意为之」。

---

[1] 參見Telford Taylor,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6-11; 參見W. Michael Reisman and Chris T. Antoniou, eds., *The Laws of War: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Primary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ing Armed Conflic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2] Taylor,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17-18.

[3] 參見國際法委員會29-30號決議案。

[4] 參見Eugene Davidson, *The Trial of the Germans: An Account of the Twenty-Two Defendant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n Nuremberg*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6), 19-20。

[5] Judith N. Shklar, *Leg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74

[6] Taylor,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466–471  
Katyń, *Documents of Genocide: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Turned over to Poland on October 14, 1992*, selected and edited by Wojciech Materski (Warsa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1993)

[7] .

[8]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als Online [Electronic Resource], compiled by James Joseph Sanchez et al., Anthony Hursh, Bdexx developer (Seattle: Aristarchus Knowledge Industries, 1995)

[9] G. M. Gilbert, *Nuremberg Dia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47); Leon Goldensohn, *The Nuremberg Interviews*, edited by Robert Gellatel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10] . 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 The Purge of Collaborators in Liberated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202–208

[11] Benjamin Frommer, *National Cleansing: 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 (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 Madeline Bunting, *The Model Occupation: The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Rule, 1940 —1945*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James Ward “Legitimate Collabo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anto Tomás Internment Camp and Its Histories, 1942—2003,”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7, no. 2 (2008):159-201

[13] László Karsai and Judit Molnár, *Az Endre-Baky-Jaross Per* (Budapest: Cserépfalvi, 1994), 101.

[14] Andrew Kornbluth, “‘ There Are Many Cains Among Us’: Polish Justice and the Holocaust,” in *Holocaust: Studies and Sources* (Warsaw: Polish Center for Holocaust Research, 2013), 9:157-172

[15] 92 805 30 1.7

[16] Gerhard Hirschfeld, *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 The Nether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 L. Huyse, “How Government in Belgium,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Organized the Return into Society of Wartime Collaborat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

n the Legacy of World War II in Europe, New York University, April 24–27, 1997

[18] László Karsai, “ The People’s Courts and Revolutionary Justice in Hungary, 1945—46,” in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World War II and Aftermath*, edited by István Deák,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3–251

[19] Ákos Major, *Népbíráskodás — forradalmi törvényesség: Egy népbíró visszaemlékezései* [People’s justice — revolutionary legality: The reminiscences of a people’s judge], edited by Tibor Zinner (Budapest: Minerva, 1988), 203







“ ”

1945年5月，蘇聯紅軍攻入柏林，希特勒在柏林地堡自殺。德國戰敗，納粹政權崩潰。德國被盟軍佔領，開始了對納粹罪行的清算。許多納粹官員和黨員被逮捕，並面臨戰爭罪名的指控。

其中，奧托·溫克爾曼（Otto Winkelmann）是納粹德國的一名高級官員。他在1944年加入納粹黨，並在戰時擔任多個重要職務。戰後，他被盟軍逮捕，並被關押在斯潘道監獄（Spandau Prison）。1950年，他被移送到西德，並面臨多項戰爭罪名的指控。在審判過程中，他辯稱自己是“受害者”，並試圖推卸責任。

然而，盟軍和國際社會對他的辯解並不買帳。最終，他被判處終身監禁。在斯潘道監獄中，他與其他四名納粹高層官員（包括魯道夫·赫斯）一起生活。1956年，盟軍決定對這四名囚犯進行減刑，並將他們釋放。然而，德國政府對此決定表示強烈反對，認為這是不公平的。最終，這四名囚犯在1965年再次被關押在斯潘道監獄，並繼續服刑。直到1987年，他們才被釋放。93歲的溫克爾曼在晚年一直受到公眾的譴責和監視。

溫克爾曼的經歷反映了納粹政權的殘暴和對個人自由的壓迫。他的故事也提醒我們，歷史的真相和正義的伸張需要時間和勇氣。

在戰後德國，許多像溫克爾曼這樣的納粹官員和黨員被清算。這反映了盟軍和國際社會對納粹罪行的嚴正態度。然而，也有一些人試圖逃避責任，甚至否認罪行。這些人的行為最終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illegible][illegible]

1949年，**Slánský** 1952年10月，**“**

國際情報局(CIC)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國際情報局(CIA) 匈牙利·賈諾斯·卡達爾(János Kádár) 蘇聯情報局 1947-1950 年

“蘇聯” 1947-1950 年 Szklarska Poręba “蘇聯” Popular Front “蘇聯” [1]

Marshall Plan [2] 20-50 “蘇聯” “蘇聯”

Maurice Papon 1961-200

「日本経済新聞」に掲載された「100」の数字は、1960年から1965年までの期間にわたって、日本経済の成長を示す指標として用いられた。この数字は、日本経済の成長を示す指標として用いられた。

## 参考文献

「日本経済新聞」に掲載された「100」の数字は、1960年から1965年までの期間にわたって、日本経済の成長を示す指標として用いられた。この数字は、日本経済の成長を示す指標として用いられた。1963—1965<sup>[3]</sup> 日本経済新聞・編集局 Marcel Ophüls 著 *The Sorrow and the Pity* 1972 日本経済新聞・編集局 20 70 日本経済新聞・編集局 20 90 日本経済新聞・編集局

「日本経済新聞」に掲載された「100」の数字は、1960年から1965年までの期間にわたって、日本経済の成長を示す指標として用いられた。この数字は、日本経済の成長を示す指標として用いられた。Klaus Barbie 著・Paul Touvier 著・René Bousquet 著・日本経済新聞・編集局 20 70 日本経済新聞・編集局 20 90 日本経済新聞・編集局

「政治的イデオロギイを越えて、人々の間に共通の価値観を築くことが、現代政治の重要な課題である」という「rat line」<sup>[4]</sup> によって、Juan Perón、Che Guevara、1983、Jacques Vergès、1987、78、

1994、Georges Pompidou、1971、1989、

1940、Marcel Déat

法蘭西抵抗運動領袖之一、哲學家Jacques Doriot於1942年  
被德人逮捕，並與Carl Oberg一同被關入拉夫勒杜維爾（Rafle du Vel'd'Hiv）  
1.3 猶太人與法國抵抗運動  
猶太人與法國抵抗運動的關係，在二戰期間經歷了許多波折。

1943年12月，法國抵抗運動領袖之一、哲學家Jacques Doriot於1942年  
被德人逮捕，並與Carl Oberg一同被關入拉夫勒杜維爾（Rafle du Vel'd'Hiv）  
Legion of Honor 於1943年12月，法國抵抗運動領袖之一、哲學家Jacques Doriot於1942年  
被德人逮捕，並與Carl Oberg一同被關入拉夫勒杜維爾（Rafle du Vel'd'Hiv）  
——1991年，法國政府正式承認了猶太人與法國抵抗運動的關係。  
1993年，法國政府正式承認了猶太人與法國抵抗運動的關係。  
Serge Klarsfeld 與 Beate Klarsfeld 夫婦，是著名的猶太人與法國抵抗運動的領袖。  
Beate Klarsfeld 於1991年，法國政府正式承認了猶太人與法國抵抗運動的關係。

1961年，法國政府正式承認了猶太人與法國抵抗運動的關係。  
Hannah Arendt 於1963年，法國政府正式承認了猶太人與法國抵抗運動的關係。  
the Banality of Evil 於1963年，法國政府正式承認了猶太人與法國抵抗運動的關係。  
Beate Klarsfeld 於1991年，法國政府正式承認了猶太人與法國抵抗運動的關係。

羅馬尼亞共產黨在1940年11月14日發動政變，推翻了國王卡罗尔二世，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1944年12月，苏联红军占领了布加勒斯特，结束了法西斯统治。1947年12月23日，罗马尼亚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1961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持中立。1974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1989年11月，罗马尼亚爆发了革命，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1997年，罗马尼亚举行了首次自由选举。2007年，罗马尼亚加入了欧盟。2014年，罗马尼亚与北约签订了新的合作计划。2019年，罗马尼亚与欧盟签订了新的合作计划。2021年，罗马尼亚与欧盟签订了新的合作计划。

20世纪90年代，罗马尼亚经历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1990年，罗马尼亚举行了首次自由选举。1991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1992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1993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1994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1995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1996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1997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1998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1999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00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01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02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03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04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05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06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07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08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09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0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1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2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3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4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5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6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7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8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9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0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1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

2014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5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6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7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8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19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0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1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2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3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4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5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6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7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8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29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2030年，罗马尼亚与苏联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





國際社會對匈牙利在二戰期間的角色，以及其在戰後被蘇聯佔領和共產黨化的過程，仍有許多爭議和不同的觀點。本文旨在探討匈牙利在二戰期間的角色，以及其在戰後被蘇聯佔領和共產黨化的過程，並分析其對匈牙利社會和國際關係的影響。

本文將從歷史背景、匈牙利在二戰期間的角色、戰後蘇聯佔領和共產黨化、以及對匈牙利社會和國際關係的影響等角度進行分析。[2]

---

[1] Charles Gati, *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8-123

[2] L. 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Fritz Bauer,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Hungary's Role in the Holocaust](#)”

[5] 德國人對猶太人、吉卜賽人、斯拉夫民族、以及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是納粹德國最臭名昭著的事實。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及其盟國在歐洲各地建立了數百個集中營，其中約有六個是專門用來屠殺猶太人的。在這些集中營中，猶太人被關押、虐待、並最終被殺害。據估計，在二戰期間，約有六百萬猶太人被殺害。——

[6] 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May 5, and June 19, 2014

[7] Jeffrey Herf, *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7-333. 這本書探討了德國在二戰後如何處理其納粹過去的問題。作者指出，德國在戰後分裂為東德和西德，兩者在處理納粹過去的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西德在戰後經歷了全面的去納粹化，而東德則在戰後繼續維持了納粹的象徵和意識形態。這種差異導致了德國在戰後對其過去的不同看法和記憶。




2040

1948

1990

1945年，歐洲各國在二戰後，開始尋求合作，以維護歐洲的和平與穩定。當時，歐洲各國的經濟都處於崩潰狀態，失業率極高，社會動盪不安。為了重建歐洲，各國開始尋求合作，並最終達成了《舒曼公約》。該公約旨在建立一個歐洲煤鋼共同體，以促進歐洲的經濟合作與發展。隨後，各國又達成了《羅馬條約》，建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這些公約的簽署，標誌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開始。

歐洲一體化的進程，是由一些關鍵人物推動的。其中包括法國的Robert Schuman、比利時的Jean Monnet、德國的Theodor Heuss、荷蘭的Konrad Adenauer、英國的Clement Attlee、美國的Ernest Bevin、意大利的Alcide De Gasperi以及盧森堡的Paul-Henri Spaak。他們在戰後積極推動歐洲各國的合作，並最終促成了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啟動。在他們的努力下，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以及歐洲聯盟等組織相繼成立。此外，歐洲各國還簽署了《Schuman Plan》、《Coal and Steel Community》、《Common Market》、《NATO》、《European Parliament》、《European Monetary Agreement》、《Schengen Area Agreement》以及《Euro》等公約和協議。這些公約和協議的簽署，進一步推動了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並為歐洲的和平與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在1950年至1960年間，經歷了快速的發展。這段時間內，歐洲各國的經濟合作日益密切，貿易往來不斷增加。同時，歐洲各國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合作也取得了顯著成果。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不僅促進了歐洲的經濟繁榮，也為歐洲的和平與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2年，波兰犹太人被驱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集中营中，他们被关押在拥挤不堪的棚屋里，遭受着饥饿、疾病和虐待。许多人在这里被杀害。

1944年，波兰犹太人被驱逐到贝尔赛茨集中营。在集中营中，他们被关押在拥挤不堪的棚屋里，遭受着饥饿、疾病和虐待。许多人在这里被杀害。

“贝尔赛茨”集中营是波兰犹太人被关押的地方。在集中营中，他们被关押在拥挤不堪的棚屋里，遭受着饥饿、疾病和虐待。许多人在这里被杀害。

1945年，波兰犹太人被驱逐到贝尔赛茨集中营。在集中营中，他们被关押在拥挤不堪的棚屋里，遭受着饥饿、疾病和虐待。许多人在这里被杀害。

1946年，波兰犹太人被驱逐到贝尔赛茨集中营。在集中营中，他们被关押在拥挤不堪的棚屋里，遭受着饥饿、疾病和虐待。许多人在这里被杀害。

1947年，波兰犹太人被驱逐到贝尔赛茨集中营。在集中营中，他们被关押在拥挤不堪的棚屋里，遭受着饥饿、疾病和虐待。许多人在这里被杀害。

---

[1] 波兰犹太人被关押在贝尔赛茨集中营 Christopher 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Buruma, Ian.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13.

Cattaruzza, Marina, Stefan Dyroff, and Dieter Langewiesche, eds. *Territorial Revisionism and the Allies of German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Goals, Expectations, Practice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3.

Foot, M. R. D. *Resistance: European Resistance to Nazi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7.

Gildea, Robert, Olivier Wievorka, and Annette Warring. *Surviving Hitler and Mussolini: Daily Life in Occupied Europe*. Oxford: Berg, 2006.

Hastrup, Jorgen. *Europe Ablaze: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1939-45*. Odense, Denmark: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Larsen, Stein U., and Jan P. Myklebust, eds. *Who Were the Fascists: Social Roots of European Fasc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Littlejohn, David. *The Patriotic Traitors: The History of Collaboration in German Occupied Europe, 1940-45*.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2.

Macksey, Kenneth. *The Partisans of Europ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5.

Mazower, Mark. *Hitler's Empire: How the Nazis Ruled Europe*. New York: Penguin, 2008.

Michel, Henri. *The Shadow War: Resistance in Europe, 1939-1945*. Translated by Richard Barry.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2.

Naimark, Norman M.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Rings, Werner. *Life with the Enemy: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Hitler's Europe, 1939-1945*. Translated by Maxwell Brownjoh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2. Rousso, Henry, ed. *La collaboration*. Paris: MA éditions, 1987.

Seidler, Franz Wilhelm. *Die Kollaboration, 1939-1945*. Munich: Herbig, 1995.

Sémelin, Jacques. *Unarmed Against Hitler: Civilian Resistance in Europe, 1939-1943*. Translated by Suzan Husserl-Kapit.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Wilkinson, James F. *The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Armstrong, John A. "Collaborationism in World War II: The Integral Nationalist Variant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0 (1968): 396-410.

Judt, Tony, ed.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1939-1948*. London: Routledge, 1989.

Moore, Bob, ed. *Resistance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Berg, 2000.

Nagy-Talavera, Nicholas M. *The Green Shirts and Other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nyder, Timothy.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Sugar, Peter F. *Native Fascism in the Successor States, 1918-1945*.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1971.

□□□□□□□□□□□□□□□□

Daumantas, Juozas L. *Fighters for Freedom*. New York: Manylands Books, 1975.

Lumans, Valdis. *Latvia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O'Connor, Kevin. *The History of the Baltic Stat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Vardys, V. Stanley. *Lithuania Under the Soviets: Portrait of a Nation, 1940-65*. New York: Praeger, 1965.

□□□□□□□□

Conway, Martin. *Collaboration in Belgium: Leon Degrelle and the Rexist Move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de Jong, Louis. *The Netherlands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oray, Jennifer L. *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Hirschfeld, Gerhard. *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 The Nether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Warmbrunn, Werner. *The Dutch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_\_\_\_\_.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Belgium, 1940-1944*. New York: P. Lang, 1993.

□□□□

Miller, Marshall Lee. *Bulgar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Todorov, Tzvetan.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Why Bulgarian Jews Survived the Holocau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Bunting, Madeleine. *The Model Occupation: The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Rule, 1940-1945*. New York: HarperCo

Ilins, 1996.

□□□□□

Bryant, Chad. *Prague in Black: Nazi Rule and Czech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elinek, Yeshayahu. *The Parish Republic: Hlinka's Slovak People's Party, 1939–1945*.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Boulder, CO: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Luža, Radomir. *The Hitler Kiss: A Memoir of the Czech Resistanc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stny, Vojtech. *The Czechs Under Nazi Rule: The Failure of National Resistance, 1939–194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Ward, James Mace. *Priest, Politician, Collaborator: Jozef Tiso and the Making of Fascist Slovak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

Aubrac, Lucie. *Outwitting the Gestapo*. Translated by Konrad Bieb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

Azema, Jean-Pierre, et al.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mages of Life in France, 1940–1944*. Translated by Lory Frankel.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0.

\_\_\_\_\_. *From Munich to the Liberation, 1938-19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Burrin, Philippe. *France Under the Germans: Collaboration and Compromise*.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New York: New Press, 1995.

Clinton, Alan. *Jean Moulin, 1899-1943: The French Resistance and the Republic*. New York: Palgrave, 2002.

Cone, Michele S. *Artists Under Vic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Corpet, Olivier, and Claire Paulhan, eds.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French Literary Life Under the Nazi Occupation*. Translated by Jeffrey Mehlman. Brooklyn: Five Ties, 2010.

Dank, Milton. *The French Against the French: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London: Cassell, 1974.

Gordon, Bertram. *Collaborationism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Hirschfeld, Gerhard, and Patrick Marsh, eds. *Collaboration in France: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 1940-44*. Oxford: Berg, 1989.

Hubert, Agnès. *Résistance: A Woman's Journal of Struggle and Defiance in Occupied France*. Translated by Barbara Mellor. New York: Bloomsbury, 2008.

Kedward, H. R. *Vichy France: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1940-1944*. Oxford: Blackwell, 2000.

Kedward, H. R., and Nancy Wood.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Image and Event*. Oxford: Berg, 1995.

Marrus, Michael R., and Robert O. 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Mitchell, Alan. *Nazi Paris: The History of an Occupation, 1940-1944*.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0.

Paxton, Robert O. *Parades and Politics at Vichy: The French Officer Corps Under Marshal Péta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_\_\_\_\_. *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1944*.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Schoenbrun, David. *Soldiers of the Night: The Story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0.

Steernhell, Zeev. *Neither Right nor Left: Fascist Ideology in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Sweets, John F. *Choices in Vichy France: The French Under Nazi Occup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aylor, Lynne. *Between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Popular Protest in Northern France, 1940-4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Fest, Joachim. *Plotting Hitler's Death: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1933-1945*.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9.

6.

Hoffmann, Peter.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_\_\_\_\_. *Stauffenberg: A Family History, 1905–19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Large, David Clay, ed. *Contending with Hitler: Varieties of German Resistance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Nelson, Anne. *Red Orchestra: The Story of the Berlin Underground and the Circle of Friends Who Resisted Hitl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Von Klemperer, Klemens. *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1938–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

Mazower, Mark.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_\_\_\_\_. *Salonika: City of Ghost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

Deák, István. "Admiral and Regent Miklos Horthy: Some Thoughts on a Controversial Statesman." *Hungarian Quarter*

ly 37, no. 143 (1996): 78–89.

\_\_\_\_\_. “A Fateful Compromise. The Debate over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Hungary.” *In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Aftermath*, edited by István Deák,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39–7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Fenyo, Mario. *Hitler, Horthy, and Hungary: German-Hungarian Relations, 1941–194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Ormos, Mária. *Hungary in the Age of the Two World Wars, 1914–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Behan, Tom. *The Italian Resistance: Fascists, Guerrillas, and the Allies*. London: Pluto, 2009.

Delzell, Charles F. *Mussolini’s Enemies: Italian Anti-Fascist Resist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avone, Claudio. *A Civil War: A History of Italian Resistance*. Translated by Peter Levy. New York: Verso, 2013.

□□

Davies, Norman. *Rising’ 44: The Battle for Warsaw*. New York: Viking, 2004.

Garlinski, Józef. *Pol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85.



Gross, Jan T.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_\_\_\_\_.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General gouvernement, 1939–194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_\_\_\_\_.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Gutman, Israel. *Resistance: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4.

Gutman, Ysrael, and Shmuel Krakowski. *Unequal Victims: Poles and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Holocaust Library, 1986.

Hanson, Joanna K. M.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the Warsaw Uprising of 19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Kochanski, Halik. *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Korbonski, Stefan. *The Jews and the Pole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Hippocrene, 1989.

Lukas, Richard C.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The Pole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39–1944*. Lexington: University Pr

ess of Kentucky, 1997.

Pilecki, Witold. *The Auschwitz Volunteer: Beyond Bravery*. Translated by Jarek Garlinski. Los Angeles: Aquila Polonica, 2012.

□□□□

Drogan, I. C. *Antonescu: Marshall and Ruler of Romania, 1940–1944*. Bucharest: Europa Nova, 1995.

Malaparte, Curzio. *Kaputt*. Santa Fe, NM: Marlboro Press, 1982.

Maldeck, R. G. *Athene Palace*. Portland, OR: Center for Romania Studies, 1998.

□□□□□□

Abrahamsen, Samuel. *Norway's Response to the Holocaus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Holocaust Library, 1991.

Hoidal, Oddvar K. *Quisling: A Study in Trea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etrow, Richard. *The Bitter Years: The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Denmark and Norway, April 1940–May 1945*. New York: Morrow, 1979.

Reilly, Robin. *The Sixth Floor: Danish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RAF Raid on Gestapo Headquarters, March 1945*. London: Cassell, 1969.

□□□□□□□□

Berkhoff, Karel C. *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llin, Alexander. *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7.

\_\_\_\_\_. *Odessa, 1941-1944: A Case Study of Soviet Territory Under Foreign Rule*. Iasi, Romania: Center for Romanian Studies, 1998.

Salisbury, Harrison. *The 900 Days: The Siege of Leningrad*.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1969.

Stepyan, Kenneth. *Stalin's Guerrillas: Soviet Partisans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

Amery, Julian. *Sons of the Eagle: A Study in Guerrilla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Burgwyn, Julian. *Empire on the Adriatic: Mussolini's Conquest of Yugoslavia, 1941-1943*. New York: Enigma Books, 2005.

Djilas, Milovan. *Wartime: With Tito and the Partis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8.

Greble, Emily. *Sarajevo, 1941-1945: Muslim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Hitler's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

ss, 2011.

Martin, David, ed. *Patriot or Traitor: The Case of General Mihailovich*.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Milazzo, Matteo. *The Chetnik Movement and the Yugoslav Resista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Roberts, Walter R. *Tito, Mihailovic and the Allies, 1941-1945*.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einberg, Jonathan. *All or Nothing: 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 1941-1943*. London: Routledge, 1990.

Tomasevich, Jozo. *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 The Chetnik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Courtois, Stéphane, et al., eds.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Deák, István. "Political Justice in Austria and Hungary After World War II." *In 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Democracy*, edited by John Elster, 124-14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Deák, István,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eds.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Afterma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De Zayas, Alfred M. *Nemesis at Potsdam: The Anglo-American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Rev. e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_\_\_\_\_. *A Terrible Reveng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 1944–19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Djilas, Milovan. *Memoir of a Revolutiona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Elster, Jon, ed. *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Frommer, Benjamin. *National Cleansing Against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Golsan, Richard J., ed. *Memory, the Holocaust, and French Justice: The Bousquet and Tournier Affairs*.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6.

Henke, Klaus-Dietmar, and Hans Woller, eds. *Politische Säkularisierung in Europa: Die Abrechnung mit Faschismus und Kollaboratio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1.

Herf, Jeffrey. *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Laguerre, Pierre. *The Legacy of Nazi Occupation: Patriotic Memory and National Recovery in Western Europe, 1945-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Lottman, H. *The Purge: Justice and Revenge in Post-Liberation France*. New York: Morrow, 1986.

Naimark, Norman M.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_\_\_\_\_.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in Germany, 1945-195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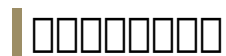
Novick, Peter. *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 The Purge of Collaborators in Liberated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almer, Domenico. *Italian Fascists on Trial, 1943-194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Rousso, Henry. *The 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aylor, Telford.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Virgili, Fabrice. *Shorn Women: 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 Translated by John Flower. Oxford: Berg, 2012.



*Amarcord*. Directed by Federico Fellini. Italy, 1974.

*Mephisto*. Directed by István Szabó. Hungary, Germany, and Austria, 1981. *Olympia*. Directed by Leni Riefenstahl. Germany, 1936.

*The Tin Drum*. Directed by Volker Schlöndorff. Germany, 1979.

*Triumph of the Will*. Directed by Leni Riefenstahl. Germany, 1935.



*Au revoir les enfants*. Directed by Louis Malle. France, 1987.

*Divided We Fall*. Directed by Jan Høbejlk. Czechoslovakia, 2001.

*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 Directed by Vittorio De Sica. Italy, 1971. *Gruber's Journey*. Directed by Radu Gabria.

Romania, 2008.

*The Pianist*. Directed by Roman Polanski. Multinational, 2002.

*The Revolt of Job*. Directed by Imre Gyönggyössy. Hungary, 1983.

*The Round Up*. Directed by Roselyne Bosch. France, 2010.

*Schindler's List*. Directed by Steven Spielberg. United States, 1994. *Shoah*. Directed by Claude Lanzmann. France, 1985.

*Shop on Main Street*. Directed by Ján Kadár. Czechoslovakia, 1965. *Sunshine*. Directed by István Szabó. Hungary, 2000.

*The Wannsee Conference*. Directed by Heinz Schirk. Germany, 1984.

□□□□□

□□□□□□

*Closely Watched Trains*. Directed by Jiří Menzel. Czechoslovakia, 1966. *Divided We Fall*. Directed by Jan Høbebejk. Czechoslovakia, 2000.

*Shop on Main Street*. Directed by Ján Kadár. Slovakia, 1965.

□□



*Army of Crime*. Directed by Robert Guédiguian. France, 2009.

*Army of Shadows*. Directed by Jean-Pierre Melville. France, 1969.  
*Battle of the Rails*. Directed by René Clément. France, 1946.

*Casablanca*. Directed by Michael Curtiz. United States, 1942.

*Lacombe, Lucien*. Directed by Louis Malle. France, 1974.

*The Last Metro*. Directed by François Truffaut. France, 1980.

*Lucie Aubrac*. Directed by Claude Bern. France, 1997.

*Mr. Klein*. Directed by Joseph Losey. France, 1976.

*The Sorrow and the Pity*. Directed by Marcel Ophüls. Switzerland, 1970.  
*The Train*. Directed by John Frankenheimer. France and Italy, 1964.

□□

*Bonhoeffer: Agent of Grace*. Directed by Eric Till. Germany, 2000.

*The Restless Conscience*. Directed by Hava Beller. United States, 1994.

*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 Directed by Marc Rothemund. Germany, 2005.  
*Stauffenberg*. Television film directed by Jo Baier. Germany and Austria, 2004.

*Swing Kids*. Directed by Thomas Carter. Germany, 1993.

*Taking Sides*. Director István Szabó. Multinational, 2001.

*Valkyrie*. Directed by Bryan Singer.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8.

*The White Rose*. Directed by Michael Verhoeven. Germany, 1982.

□□

*Carve Her Name in Pride*. Directed by Lewis Gilbert. Britain, 1958.

*Charlotte Grey*. Directed by Gillian Armstrong. Britain, 2001.

*Island at War*. Television series directed by Peter Lyndon. Britain, 2004. *Odette*. Directed by Herbert Wilcox. Britain, 1950.

□□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Directed by John Madden. Britain, 2001.

□□□

*General Della Rovere*. Directed by Roberto Rossellini. Italy, 1959.

*Life Is Beautiful*. Directed by Roberto Benigni. Italy, 1997.

*Rome, Open City.* Directed by Roberto Rossellini. Italy, 1945.

*Seven Beauties.* Directed by Lina Wertmuller. Italy, 1976.

□□

*The Silver Fleet.* Directed by Vernon Sewell. United States, 1943.

□□

*Heroes of Telemark.* Directed by Anthony Mann. United States, 1965.

□□

*A Generation*(1954), *Kanal*(1956), and *Ashes and Diamonds*(1958). Trilogy directed by Andrzej Wajda. Poland.

*Katyń.* Directed by Andrzej Wajda. Poland, 2007.

*To Be or Not to Be.* Directed by Ernst Lubitsch. United States, 1942.

□□□□□□□□□□

*Come and See.* Directed by Elem Klimov. Soviet Union, 1985.

*Days of Glory.* Directed by Jacques Tourneur. United States, 1944.

*Defiance.* Directed by Edward Zwick. United States, 2008.

*The North Star*. Directed by Lewis Miles. United States, 1943.

□□□□

*Chetniks*. Directed by Lewis King. United States, 1943.

■ □□□□

*Judgment at Nuremberg*. Directed by Stanley Kramer. United States, 1961.

*Man of Marble*. Directed by Andrzej Wajda. Poland, 1977.

*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 Directed by Rainer W. Fassbinder. Germany, 1978. *The Reader*. Directed by Stephen Daldry.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8.

*The Third Man*. Directed by Carol Reed. Britain, 1949.